

2013 年第 5 期

总第 65 期

学科信息参考

A 辑

（经贸、金融、会计、管理、信息）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学科信息参考

2013 年第 5 期 总第 65 期

目 录



主办: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编:

王 群 谢丹迎

责任编辑: 孔凡娟

编辑:

经贸: 赵珊珊

金融: 唐永辉

工商管理、商务信息: 李谋信

制作: 艾致

出版日期:

2013 年 9 月 30 日

国 际 贸 易

TPP 横向议题与下一代贸易 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

产 业 经 济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研究评述..... 7

物 流 管 理

标准化对我国物流产业 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15

技术经济与管理

技术经济理论在施工成本控制中的应用.....22

会 计 学

关于《银行会计学》课程教学实践的思考25

金 融 学

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异象研究——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分析.....28

企 业 管 理

国外组织创新搜索研究述评.....30

统 计 学

提高缴费率还是推迟退休?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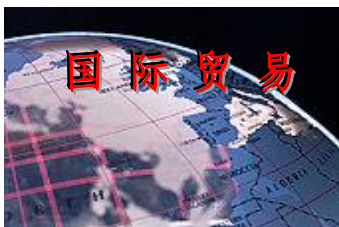
快 讯

上海自贸区开启“全球化红利”第二波50

铁矿石期货获批 国企钢厂担心“被金融化”风险.....51

京沪深中心商圈推出国际快运移动作业.....	52
人行强势表态同业问题意在主导协调监管.....	53
李克强夏季达沃斯开幕演讲实录.....	55
李克强施政路线图渐明晰.....	58
中国国债期货定价锚效应长远可期.....	59
金融危机：救市大战留下的五个教训.....	61
中国商学院靠什么脱颖而出？——第三届“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对话院长、教授精彩观点.....	65
2003Q1-2012Q3 企业景气指数.....	66
2012Q3行业景气指数.....	68

TPP 横向议题与下一代贸易 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横向议题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谈判进程中的难点,也是美国推行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关键议题。在 TPP 研究的众多文献中,涉及 TPP 横向议题者很少。美国期待 TPP 谈判在横向议题方面取得突破,使 TPP 成为 21 世纪自贸协定(FTA)样板。我国学界在 TPP 横向议题的研究上应该有所作为,为我所用。本文拟对 TPP 横向议题的基本内涵、特点、趋势进行研究,并就其影响及中国应对加以分析。

1 TPP 横向议题基本内涵

横向议题(horizontal and cross-cutting issues)长期来一直是 TPP 谈判各方关注的焦点。2010 年初 TPP 谈判启动时,美国提议的横向议题名目繁多,难以为各方接受。在 TPP 第 17 轮谈判中,有些谈判成员对部分棘手的横向议题依然表示冷漠,悻悻然敷衍之。从程序和进程上看,TPP 谈判中涉及的横向议题现已紧缩到五大问题,即规则一致、国有企业、电子商务、竞争和供应链、中小企业。下文着重分析这五大议题及其基本内涵。

1.1 规则一致(regulatory coherence)议题

美国认为,在其主导下建立的全球贸易规则已经不适应新世纪经贸活动的要求。其举例说,亚太地区非关税壁垒现象严重,主要原因就是各国规则不统一。为要继续主导地区和全球贸易格局,美国主张规则一致,要求各国把加入 TPP 过程当作是一个同美国规则看齐的机会,确保 TPP 地区商业运行规则同美国保持一致。

1.2 国有企业议题

这是一个同“规则一致”密切相关的议题,是美国运用“竞争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政策建立下一代贸易规则提出的实质性要求。美国人认为国有企业扭曲了公平竞争,因为国企可以从政府渠道获得各种优惠,包括可以获得政府补贴、得到廉价贷款、通过政府采购渠道优先销售产品、从政府那里得到贸易保护。政府给国企的这些支持导致市场竞争环境发生扭曲。国有企业问题在 TPP 谈判成员中主要涉及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防止国有企业继续垄断,免使跨国公司处于不公平竞争地位,美国主张,TPP 协定必须保障外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但是在 TPP 第 17 轮谈判上国企问题依然是最不易突破的两大难题之一。

1.3 电子商务

美国作为信息技术高端开发者,希望通过制定电子商务规则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利益制高点。美国甚至主张,互联网数据自由传输或跨境流动不应受到限制,希望通过 TPP 将因特网数据自由传输议题建构为国际规范。但是,美国的主张无法得到其他谈判者的认同,经过几轮谈判,有关因特网数据自由传输的约束性规定暂时没有列入最后文本。TPP 电子商务条款将对互联网交易制订规则,包括海关关税、数码环境、电子交易授权、消费者保护等内容。美国首席谈判威舍尔认为,数字经济是 TPP 协定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

1.4 竞争力和供应链问题

由于中间产品需求日益扩大,国际和地区供应链设施日益成为影响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大问题。在中间产品供给过程中,需要多次进出主权国家管辖领域,各国对供应链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亚太地区各国标准差异、基础设施尚不健全、原产地规则计算复杂、通关措施效率低下,因此,任何处于供应链上的企业都面临突然断链的风险。完善供应链,建立无缝对接,已经成为 TPP 谈判及最后协定的重点。

1.5 中小型企业议题

TPP 协定草案专设中小企业一章,旨在促进中小企业进入 TPP 市场,美国要求 TPP 市场保障美国中小企业产品进入。2011 年 11 月发表的 TPP 协定纲要指出,TPP 协定应该解决中小企业获得贸易机会的能力。美国认为,中小企业在美国非农业私有领域雇佣了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其在美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TPP 协定必须保障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由上所述,横向议题包括国有企业、供应链、竞争、规则一致、中小型企业生存等问题。横向议题一旦形成协定条款,就成为跨部门适用规则。美国希望以美国的法规和商业实践为准绳,通过 TPP 谈判协调各国法规和标准,将整个地区的规则统一到美国的规则 and 标准之中,用希拉里·克林顿的话来说,就是要对亚洲国家实施“边界后规则改革”。美国还认为,上述五大议题还不是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全部,横向议题必须体现美国的价值观。

2 横向议题谈判进程及其特征分析

TPP 横向议题是在多哈回合谈判未果的背景下,美国调转聚焦目标,要在亚太地区做出努力,使 TPP 成为其主导新一代贸易规则的切入点。横向议题从倡议到最后提出协定文本,前后大致经历了以下 4 个阶段。

2.1 TPP 横向议题谈判的进程阶段

(1) 原则确立阶段

2010 年初,美国确立了横向议题的基本原则,即有助于促进新技术发展、有助于为中小企业创造出口机会、有助于支持现有生产和供应链。

(2) 议题试探阶段

TPP 谈判启动后,美国不断提出同下一代贸易规则相关的新议题,试探各方反应,直至 2011 年 11 月才最后确定上述 5 个议题,暂定为 TPP 谈判解决的横向议题。

(3) 讨价还价阶段

各国代表一开始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横向议题,第一年,只有美国正式提出过一份横向议题文本建议,第二年,开始只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附和美国的建议,提出了“规则一致”议题的文本建议。其他代表在美国强力干预下,不得不对横向议题陆续加以审议。不过,在审议中许多谈判代表曾经对国企议题表示“强烈反对”,对劳工标准等议题发生激烈争执,在其他问题上出现了讨价还价的情况。

(4) 文本初步完成阶段

现在 TPP 最后协定文本暂定为 29 章,横向议题涉及许多章节,含有许多敏感且具争议的问题。TPP 谈判至 2013 年 5 月底共进行了 17 轮,各方在谈判中经历了抵触、勉强介入、逐步接受、讨价还价的过程,从中希望寻求到符合各自利益的平衡点。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横向议题的谈判仍

将是未来几轮 TPP 谈判的重点和难点。从谈判进程及对文本内涵分析来看,

2.2 TPP 横向议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美国主导性

TPP 起源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SEP), 2006 年 5 月正式生效时, 智利、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是创始国, 简称 P4 协定。美国不是创始成员, 照理必须服从既有的协定要求申请加入。可是, 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全面加入 TPSEP 谈判之后不久, TPSEP 也就被 TPP 取代。谈判开始后, 美国要求对原有的协定逐条加以审议。如果说 P4 协定启动时还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小国间贸易协定的话, 那么随着美国的介入, 亚太区域经济贸易架构因此发生重大变动, 美国在其中扮演了反客为主的角色, 成为 TPP 议题特别是横向议题的倡导者、主导者。

(2) 标杆引领性

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从传统垂直型进程向跨部门横向型方向转变, 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把矛头直接指向边界后规则改革, 使横向议题成为下一代贸易规则的新标杆。传统贸易议题实际上大多可以量化, 比如关税, 其数据既有历史的积累, 也有现实的记录。但是, 在横向议题中有不少都是难以量化的, 比如非关税壁垒问题, 在有些国家这是政府政策中的一部分, 而在其他国家, 则是政府隐蔽的对策。美国试图将一系列横向议题首先列入 TPP 协定条款, 而后引领其他 FTA 协定制订。

(3) 外溢于非贸易领域

TPP 横向议题涵盖的领域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贸易范围。美国在横向谈判中提出的劳工权利、因特网规则等标准, 超出了例行的贸易协定范围, 向社会领域甚至价值观领域外溢。

(4) 政治博弈特性

美国通过制定国际规则或者改造国际规则来保障自身利益, 以最低的成本达到主导全球和区域贸易进程的目标, 其实质就是通过运用政治权力, 在区域一体化和经贸领域发生效应。TPP 横向议题谈判体现了经济要素和政治谈判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征。

(5) 呈现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规则走势

随着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 供应链和技术贸易问题相互影响, 创新、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政策等问题同边界后规则相关。美国官员多次提出, 解决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规则问题是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重点, 而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中之重就是边界后规则, 其中包括贸易便利化、数据自由流动、市场驱动的创新政策、透明度、非歧视政策、标准化、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竞争中立等。美国学者认为, TPP 横向议题核心就是下一代贸易规则。笔者认为, 随着谈判的深入和发展, 未来横向议题不可能仅限于上述 5 项。根据美国国会“5月10日议案”, 至少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一定会进入美国同外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条款之中。因此, TPP 横向议题无疑就是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议题。

2.3 TPP 横向议题凸现的主要原因

(1) 国际贸易环境变动

即使在世贸组织成立初期, 国际贸易行为基本上依然是在传统贸易概念主导下进行的, 关税减让和原产地以及由此涉及的进出口配额是国际贸易谈判的核心内涵, 这是国际贸易活动相对简单的时代, 国际贸易的规则和议题并不复杂。21 世纪国际商贸环境变动的最大特点是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 跨越边界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可以在“弹指一挥间”完成, 于是传统贸易概念和经营活动难以应对新世纪的交易方式, 确实也需要议定新的规则来适应新时期贸易环境变动的要求。

（2）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供应链基础设施难以满足新世纪市场需求

20 年前，跨国公司已经意识到时间和服务的重要性，但不如当前这样紧迫。在管理信息化和电子贸易流行的新世纪，企业需要夯实国际供应链设施，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在不严重影响生产效率和及时性的前提下可以布局全球更加广泛的区位。在新世纪，中国等其他亚洲经济体迅速上升为供给中间产品的重要国家，供应链和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21 世纪贸易活动面临“快速运达”的市场要求和挑战，“迅捷”是新世纪供应链的发展趋势。供应链问题因而成为横向议题中的主要内容，甚至关乎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3）美国的驱动作用

在“新加坡议题”和多哈谈判未果的背景下，美国作为国际机制创始者努力推动 TPP 横向议题。国际贸易体制议题的主导者历来由经济强国担任，强者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无疑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霸主地位、权力和利益，不仅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主导议题设计，而且从肯尼迪回合开始，主动扩展或延伸相关议题，提出了议题平衡问题。1990 年以来，美国 FTA 谈判出现了议题扩大趋势，WTO+ 议题增多。尤为突出的是，新世纪初，美国在同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分别签定的 FTA 协定中，都增加了相关议题，如劳工议题等。这预示着美国要改变既有的贸易规则。

3 横向议题的影响作用及中国应对

TPP 横向议题尽管在美国主导下成为 TPP 谈判的重点，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议题毕竟体现了新世纪国际贸易环境变化条件下的全新贸易图景，预示着国际贸易规则正在酝酿重大变革。实际上，WTO 秘书长提交的 2011 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指出了这一变动前景，认为新世纪区域贸易协定提出的条款和规则超越了世贸组织的政策领域，其中包括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投资等领域，特别是边界后的政策领域。

3.1 TPP 横向议题对 TPP 谈判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

（1）将继续成为 TPP 谈判的热点问题

从这些年 TPP 谈判进程看，由于部分国家反对，美国对横向议题项目做出了调整，劳工问题等暂时不作为当前谈判的要点。但是从美国—哥伦比亚 FTA 等协定中可以看到，劳工问题等已经列为协定条款。目前 TPP 谈判的相关议题中虽然没有把劳工标准问题放入谈判清单，但不等于以后不再提出。

（2）国际贸易规则争议的表现形式由主张管辖边界逐渐演变为管辖边界后争议

多边贸易体制建立在《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之上的规则，本质上体现了 20 世纪较为传统的贸易规则，关税减让仅仅体现了那个时代贸易活动的特点，其核心要求在于管住边界。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出现和推广，21 世纪贸易活动趋于复杂化，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将直接指向边界后规则改革，TPP 横向议题显现出贸易规则变动未来走势的基本方向。

（3）消除非关税壁垒成为 TPP 横向议题和国际贸易规则改革关注的新焦点

TPP 协定谈判的重点不再是关税和配额问题，创始成员的关税率早已达到 WTO 的平均值之下，现在关注的焦点是非关税壁垒问题，它们对技术贸易影响巨大。这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当前意向，或许这也是国际贸易发展到新阶段的现实要求和趋势，任何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都无法回避。发达国家希望通过投资最优区位，把技术和生产转移到成本最优地点，实现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目标。发展中国家有不少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增长阶段，希望通过国际贸易和招商引资实现国家发展战

略目标。如果两者相向而行，隐含着追求共同利益的本质要求，完善国际贸易规则可能预示着南北关系出现变动的新趋势。

（4）TPP 横向议题凸显出美国渴望打开亚太服务贸易市场的紧迫要求

对美国而言，TPP 市场不是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重点。美国要把 TPP 打造成一个 21 世纪高质量的样板协定，意图要在投资、服务和技术商品交易中居于主导地位。美国前贸易代表罗恩·柯克说，美国决不是要让 TPP 成为以往 FTA 协定的翻版，而是建设未来亚太地区的多边贸易框架，其关键就是服务贸易。这或许也是美国要求日本加速进入 TPP 的经济目的，因为至少日本的金融服务业水准高于其他亚太国家。

（5）美国将利用 TPP 横向议题施压 WTO

美国曾经在 1997 年利用 APEC 制订《信息技术协定》，然后迫使欧盟作出让步。美国现在则利用 TPP 谈判和横向议题对 WTO 谈判甚至跨大西洋自贸区谈判施加压力。由部分 WTO 成员协商进行的“服务业多边协议”已经启动，美国针对欧盟信息流动的限制，在日内瓦进行的“服务业多边协议”谈判中可能提出“信息自由流动”议题，主张信息自由流动成为国际新规则。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主张，现在应该结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简单的划分办法，建立以美国为引领作用的经济体集团，实施符合这一群体利益的国际新规则，其中包括限制国企、竞争中立、贸易便利、保护知识产权等新议题，甚至包括劳工、环保等。横向议题还可能是 21 世纪新区域主义。鲍德温说，21 世纪新区域主义较之 20 世纪区域主义的最大差别是议程差别。新世纪以前，人们关注的是特惠关税和市场准入互惠，而在新世纪，人们关注的是贸易—投资—服务为基础的新规则，传统的“垫脚石—绊脚石”理论以及维纳经济学难以解释新世纪的区域主义，21 世纪区域主义是以规则修订者角色问鼎全球贸易规则，本质上是对 WTO 提出的挑战。这也应当成为研究 TPP 横向议题的意义所在。

总之，TPP 横向议题已经突破了一般贸易议题内涵，向社会领域、边界后规则等国内法法规方向转移，这些议题作为非传统贸易议题，其内涵大多已经难以量化和分割。作为新世纪贸易政策问题，TPP 横向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或者通过某种博弈方式寻找答案。它们大多可以归纳为非关税壁垒议题，照理不应成为过分张扬的问题，解决方式和解决时间应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或许可以成为引领下一代贸易规则的标杆。现在竟然成为一大难题，关键在于美国主导过程中表现出的强势和刚性要求，给谈判者以压力而形成反弹的结果。

尽管中国目前没有参与 TPP 谈判，但是 TPP 横向议题对中国有重大影响。

3.2 TPP 横向议题对 TPP 谈判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

（1）对中国的区域合作战略是一个冲击

TPP 总体上对中国的区域合作战略是一个冲击，加强周边地区合作是中国夯实周边地缘战略依托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之后，中国坚持建设东盟中国自贸区（10+1），全面落实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11～2015 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升至 3628 亿美元（2011 年），是十年前的 5 倍；中国力推东盟加中、日、韩（10+3）东亚一体化合作进程，已经制定并落实《东盟加 3 合作工作计划（2007～2017 年）》。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中国一直发挥促进作用，引领东亚合作。美国在东亚地缘经济格局变动背景下主动介入 TPP，希望在亚洲有一个平台，主导亚太地区一体化，这打乱了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拥有的格局和优势。

（2）对我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TPP 横向议题对我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美国提出的横向议题是在多哈回合谈判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移师亚太，借壳上市，另起炉灶，试图用新一代标准和规则来重新塑造自由贸

易协定。美国引入的规则超越了 WTO，提出的劳工条例、国有企业、因特网信息自由流动等，同传统贸易议题没有关系。但是，这些议题一旦变成 TPP 协定条款后，将成为美国未来同第三方谈判的样本，而且可能演变成全球性标准，这也就是 TPP 横向议题如何影响新一代 FTA 的根本性玄机。TPP 横向议题将对既有的 FTA 产生颠覆性影响，成为新一代 FTA 的样板。这些标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符合任何经济体的发展方向，不过，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再次确认的机遇期内，这些规则 and 标准超过了我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架构可以接受的现实，可以说，要是现在接受 TPP 横向议题的有些标准，中国的整个社会体制都将受到震动。

3.3 中国应对的措施

(1) 谨慎对待中国加入 TPP 问题

谨慎对待中国加入 TPP 问题。如上所述，TPP 横向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贸易行为规则的未来走向，美国视之为高品质协定的要旨，其中涉及的非贸易内涵包括劳工标准等，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政治体制是一个冲击，需要认真对待，不能轻易接受。而且美国奥巴马总统 2013 年 5 月初访问哥斯达黎加时，对钦奇利亚总统明确表示，TPP 当前工作重点是要完成协定谈判，而不是新增成员。在此背景下，中国更要慎言加入问题，以免自取其辱。

(2) 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遵循我国既有的地区合作战略，抓东盟、联日韩，继续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当前，应在中共十八提出的关于“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的指引下，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应该从协调博弈角度，构建相互舒适的战略伙伴关系，制订建设地区利益共同体总规划。

(3) 确认和推动中国、东盟和美国的合作关系

在东南亚地区接受美国的存在这一事实，确认中国、东盟和美国的合作关系，在协调基础之上推动三边合作。目前，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贸易关系博弈中，尽管有很多域外国家介入，但是，基本的力量还只是中国、美国和东盟三方。其中，中国是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驱动力量，东盟是地区一体化制度建设的基石，美国则是亚太地区的重要一员，美国已经进入东盟发展进程之中。这是地区协调的主要力量。中国、美国、东盟三方可以考虑建立合作协调机制，推进地区合作进程。

(4) 中国和东盟通过协商进入美国提出的下一代贸易和投资问题解决进程

东盟已经有 4 个国家加入了美国主导的 TPP 谈判，根据不久前签署的美国东盟“E3 倡议”，双方已经把下一代贸易规则提上议事日程。东盟又在 2012 年 11 月决定推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也是一份紧随 TPP 的高规格协定，其中的相关议题同美国提出的下一代贸易规则保持一致。因此，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同美国和东盟协商下一代贸易和投资问题。

(5) 在 10+3 功能性合作领域做出更加务实性贡献

中国不能轻易放弃 10+3，中国应在 10+3 功能性合作领域做出更加务实性贡献。进一步加强研究中国东盟合作，协商建立 2015 年东盟共同体建立后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新规则，以确保中国东盟战略中的主要内涵即贸易和投资合作进程能够顺利推进。结合《东亚合作联合声明 II》与《东盟加 3 合作工作计划（2007～2017 年）》，应在盘点粮食安全、农林、生物能源、防灾减灾、人文教育等具体领域前期合作项目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落实措施、追加项目，深入推进东盟中国合作进程。

作者：蔡鹏鸿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3 年第 7 期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研究评述



1 引言

针对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科技自主创新等宏观经济背景,本文试图通过综述现有的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系统建设提供理论和政策基础。基于现有的文献综述和分析,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体系,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利用生态系统的视角解释现有的产业创新过程和现状,最终提出有效的产业创新发展政策建议。本研究围绕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生态视角下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新特征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等三方面的内容而展开。此外,本文认为,在理解产业技术创新系统内涵的过程中,应同时考虑在产业内部存在的不同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即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通过对于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综述和评价,本文希望能够开启对此主题的深入研究,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实现如下目标。首先,解释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建设的一般规律。通过建立产业技术生态创新体系,分析科技、产业和市场之间的整合、互动、演进过程,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以降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技术创新成果尽快产业化和市场化;其次,理清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的理论内涵和意义。在充分理解创新生态体系内涵和边界的基础上,采用生态视角理解产业竞争和演化,并确保在全球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有利位置;最后,产业生态视角下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生态系统的视角理解技术创新政策和战略,我国既有的产业发展思路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进行政策修正。

2 文献综述与评价

近年来关于产业生态创新体系的相关理论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综合分析现有研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

(1)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多元合作系统

生态学中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在各种生物以及生物群落与其无机环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相互作用的一个统一整体。而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是指产业内部实施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机构和制度的总和。产业技术创新系统是对于技术创新理论的拓展。创新生态系统论是从企业仿生学角度解释企业创新的一种理论,是基于网络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仿生学研究为产业组织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如企业生命周期理论。Hannan 和 Freeman 提出的组织种群生态学”观点,认为是在一个特定边界内的、具有共同形式的所有组织构成的种群,同一个种群中的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的不同影响着这些组织的活动方式及其结构。Moore 认为,企业生态系统是以组织和个体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Adner 提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观点,他认为,企业创新往往不是单个企业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要通过与一系列伙伴的互补性协作,才能生产出具有顾客价值的产品。国外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商业生态系统战略的确立。

国内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相对多一些。陆玲提出的企业生态学理论,将企业生态学定义为“研究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提出“企业生态链”、“企业生态网”、“企业生态系统”以及“企业生态对策”等概念,并以生态学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企业管理学与企业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李湘桔、詹勇飞认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质在于融合知识使创新主体具有完备性,并提出创新生态系统管理矩阵的概念。从知识获取渠道看,可分为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从创新所需的知识性质看,可分为创新主体知识和创新协作知识。吕玉辉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形成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该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有某些相似性。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由实施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机构、制度及周边环境要素的总和构成。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和目的性,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有序的流动,而且具有稳定性和平衡性的特征。

表1 自然生态系统与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相似性

相似性	自然生态系统	技术创新系统
组成要素	以生物为主体的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	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要素之间的关系	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	同行业创新活动之间、创新与经济法律和金融环境之间相互作用
系统性层次性	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局部个体、群落、生态系统	决策研发营销部门之间以及与企业外部环境各要素之间构成一个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分为企业、区域、国家创新系统
反馈特性空间特性	正反馈和负反馈一定地理范围空间内	正反馈与负反馈一定地理范围空间内的企业、企业集团、企业集群
营养结构开放的系统	营养关系输入、处理、输出	物流、能流和信息流关系物质、知识、人才等的输入、生产、产品输出
功能	物种流动、物质循环、生物生产、资源分解	物质流动、创新扩散、价值流动、信息流动、生产活动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影响着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的发展,在此研究视角下,研究者主要关注产业内部网络主体间以合作和竞争为特点的协调与演化过程。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它把研究情境置于双边关系、产业背景、乃至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等不同的层面。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对于组织所面对外部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理解,并通过解释核心企业如何塑造环境特征来说明他们取得成功的原因,如沃尔玛、微软等核心企业。

Adner 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企业间通过协作的方式,结合各自的产品优势,形成一种紧密合作的、面向客户的解决方案。生态系统所创造的客户价值是个体企业所不能比拟的,一些研究如平台领导者、开放式创新、价值网络、超链接组织等,都是在此概念范围内进行讨论。

总之,创新生态系统论认为,企业自身的创新系统是一个生命系统,它与其他企业创新系统构成了产业创新系统的多样性,同时它又是产业创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同产业的创新系统又是区域创新系统或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的主体: 多主体参与

产业技术创新系统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产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应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种群关系理论,研究创新系统中企业间的生态关系,而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则偏重于技术创新战略的研究。

Moore 认为,产业生态系统以企业为中心,特别是拥有核心能力的企业。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由各种各样的生物物种(成员)所组成,成员相互间存在各种复杂关系。生物物种主要包括企业个体及同质企业(相同的技术、供应商、用户等)所形成的种群,消费者、供应商、市场中介、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等;相互间的各种复杂关系既有垂直关系,如供应商、消费者、市场中介机构等关系;又有水平关系,如竞争对手、其他产业的企业、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利益相关者等关系。它们分别形

成了核心生态系统、扩展生态系统和完整生态系统三个层面。Christoph 等提出了服务创新生态系统,认为系统的主体包括平台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客户以及中介组织。吕玉辉也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创新源、研究开发、制造和营销用户、部件供应商及其他企业和个人、科研院所、中介、政府有关部门等,而各要素之间的协作、联结显得尤为重要。

(3)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的结构: 以平台为中心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由不同的产业链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开放的、多维的、复杂的网络结构。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结构具有开放式创新系统的特征,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开放的、与社会有着全方位资源交换的、而且不断在做内部调整的动态系统,具有自身所在系统没有的特性和功能。产业生态系统研究逐渐从个体、到种群范围、最后扩展到种群之间的关系层次。

杨忠直总结了企业生态学的理论体系,认为企业生态学的研究范畴可以分为个体、种群、产业集群和生态系统四个层次。具体到技术创新战略层面,创新系统主要侧重创新平台的研究。如 Christoph 等认为,服务创新系统是由多个主体围绕创新空间开展的协作活动。

图 1 构建了服务生态系统创新互动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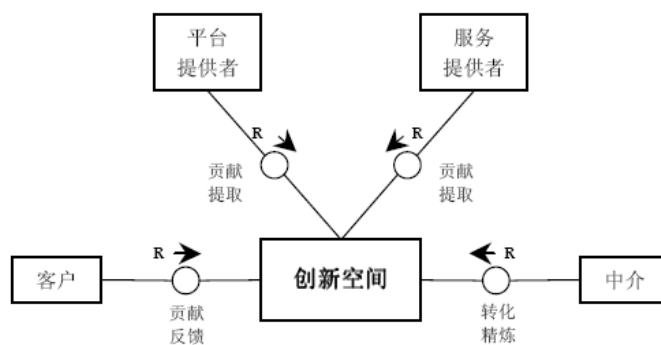


图 1 服务生态系统创新互动模型^[15]

陈斯琴则提出了基于创新平台的产业技术创新系统模型,其结构由核心层、开发应用层及创新平台构成。

大量的行业通过涉及多边行为契约的平台形式来实现有效组织。随着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双边网络平台市场发展迅速,人们不仅创建了一些全新的平台(如把广告主与网络搜索用户联结起来的谷歌),而且把一些传统的业务改造成了平台(如电力零售市场正在演变为把消费者与特定发电厂商匹配的平台,能让消费者自由选择是使用价格较低的火电还是价格较高的可再生电力)。与传统的组织形式不同,平台市场通常是双边市场,因为平台的提供者必须协调用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2.2 生态视角下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新特征

(1) 系统动态演化特征

Moore 认为,企业应该着重考虑自身如何作为一个复杂演化系统的参与者。以苹果公司的 iPod 音乐播放器为例,没有一个产品零件或配件是苹果公司直接生产的,零件供应商、唱片公司、消费者、音乐下载网站等主体能够围绕其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系统。新的产业形态或者生态系统总是处在不断地形成、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中。

现有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对于系统特征的总结基本来自于对生物生态系统特征的类比。通过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较、并结合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一般认为,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动态的、演化的特征。胡斌则从成员和系统两个角度思考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产业生态系统成员具有生态性、决策活性、智慧性特征;产业生态系统则具有相互适应、共同进化的系统化、集成化创新性特征。戴宁认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演化性、协同进化性、竞争性、多样性和平衡性等特征。

(2) 产业竞争的新特征

产业内部的竞争也不再局限于企业和企业之间,而是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创新生态系统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松散的网络关系。Prendergast 和 Berthon 认为,这种松散的联系能够提供伙伴选择和系统设计的灵活性。Moore 认为,像苹果、IBM、福特、沃尔玛等都是商业生态系统的核

心企业和领导者，但是它们的价值体现离不开整个生态系统的支撑。Hearn 和 Pace 认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将从简单的合作向复杂的合作转变。例如，在电信领域，使用兼容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网络可以影响其他技术生态系统的消费模式。在市场竞争中，个体企业的生存十分依赖于整个商业生态系统是否能够获得竞争优势。

（3）技术范式的新特征

产业技术创新范式呈现出以“平台”为中心的特征，生态系统的成员可以利用技术平台、工具平台或服务平台提升自身的绩效水平。如软件公司可以使用微软的开发工具设计基于视窗操作系统的程序，或者说这些软件公司一直在为微软提供平稳的新应用程序产品。英特尔和微软都是各自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和领导者。Iansiti 和 Richards 认为，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平台提供者扮演着关键角色，加强了创新成果。以平台为中心的创新系统强调网络价值，而不是产品价值。

2.3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的边界

在国内外对于产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中，存在几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与生态学相关的概念，例如，产业生态系统、生态组织等概念，都采用生态学视角来研究不同的问题。

（1）商业生态系统

Moore 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Iansiti 和 Levien 对许多公司的“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和观察后得出结论，任何不同的组织或个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或依赖于特定的业务、技术或标准，所以强调企业内在能力的传统商业范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强调广泛联系的“商业生态系统”。成功的企业都是利用了他们的“关键优势”，通过整个商业网络的合作来获得竞争力，得益于一个超乎于他们自身公司范围的、更广泛的环境而成功，那就是它们各自的“创新生态系统”。在企业层面，英特尔和 SAP 都认为，统一技术平台和产业生态系统是促进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比较接近产业或企业生态系统，尤其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出，使理论研究的内容逐渐聚焦到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上来。

（2）集群创新网络

随着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集群创新呈现出合作网络化的特征。网络化集群创新理论认为，集群内存在前向、后向和平行的产业联系的供应商、生产商、销售代理商、顾客之间，企业与当地政府、大学或研究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服务组织等相关支撑体系之间，通过长期的联系形成本地化网络。这种网络包括产业网络和区域创新网络。网络中的各行为主体之间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频繁地进行着商品、服务、信息、劳动力等贸易性或非贸易性的交易、交流和互动，相互学习，密切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的发展和企业的持续创新。集群创新网络的研究，依旧侧重把外部网络作为既定的环境因素，企业是既定创新网络资源中的节点。

（3）开放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的研究内容与创新生态系统类似，但是概念本身并不是受生态学视角的启发而提出的。相对于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式创新只是一个企业内部技术创新战略，强调外部人才和知识的重要作用。开放式创新研究的战略意图和研究问题明显区别于创新生态系统。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和以上概念有所区别，它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聚焦于技术创新理论和政策研究，引入仿生学视角的目的，在于理论研究的便利，认为在生态学研究的视角下，更加能够获得对于产业技术创新机理的深刻理解。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主要关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和关注对象的特征上，

区别于集群创新网络的研究。此外,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还区别于商业或产业生态系统,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是由产业生态系统发展而来的,技术创新系统是产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生态特征。

2.4 基于产业情境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和政策启示

就具体产业而言,生态视角下的产业创新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讯产业。熊炜烨和张圣亮通过类比法,分析了通讯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他们认为,通信产业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在系统内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通信产业生态系统发展和演进的。在通信产业生态系统中也会有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或者运营商,或者某类提供商。随着时间的变迁,具有领导作用的企业也可能会发生改变。娄成武和李丹分析了我国电信产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他们主要从生态系统演化和平衡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电信产业结构的现状,并说明我国电信产业政策的特点。

生态视角下,政府政策目标也在于整个生态系统的治理。戴宁认为,政府应采取的政策和行为主要包括:营造良好的系统外部环境,鼓励科技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融入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

总之,将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相结合,需要理解与说明两者各自的特点,如对于生态系统视角的准确把握;对现有产业竞争、产业结构、产业创新、产业演化等方面表现出的新特点的理解和判断。只有在对于产业现状和技术创新战略特征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引入“生态系统”的视角,不然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简单类比过程中。

在政策启示方面,需要理解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以此来制定科技政策。如创新生态系统不同于产业创新系统和部门创新系统。产业创新系统的侧重点在于做大企业,因此政策目标在于有竞争力主体的构建;部门创新系统强调主体互动、功能完整性的创新经济,因此政策目标在于公共知识、技术、服务平台的建设;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共同参与的概念,所以政策目标不能只倾向于资源对大企业的集中,因为大企业并不能决定创新生态系统的有效性,大唐的 TD 项目便是一个资源向大企业集中的例子。对于创新生态系统,政策目标应着眼于生态治理规则的建立。

2.5 现有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评价

综合考虑前文的论述,现有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存在如下问题。

(1) 概念模糊,内涵界定不清楚

因为生物类比法应适用于科学性的要求,现有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中经常混淆了产业创新系统、企业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等概念,如这些概念都涉及“网络”的研究。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以在新的生态系统视角下明确界定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内容,即“是什么”的问题。

(2) 研究缺乏产业情境。产业技术创新系统

还是一个新的理论和概念,对于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的研究明显缺乏具体产业联系,使得理论研究脱离了实际产业基础。现有的一些理论研究虽然涉及到电信等信息技术产业背景,但是产业技术创新系统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需要更加广泛的产业联系和基础。下一步的理论研究中,需要明确理论的研究对象,即对话什么产业的问题。

(3) 技术创新范式不确定

现有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研究是在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究竟能够为技术创新研究的发展带来何种具体的战略范式,在新的视角下,企业或者产业技术创新战略应该如何实施,这些问题还不是很清晰。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需要明确如何做的问题。

（4）缺乏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现有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研究还不能够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建议。根据生态系统视角，产业政策的制定如何才能促进创新环境的建设，从而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加快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5）研究内容有模糊化的趋势

企业管理研究的对象从企业到产业，从个体到网络化，从网络到生态系统，研究的对象和问题越来越复杂。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正好反应了这种趋势，并认为生态系统有动态演化的特性。在此研究视角下，研究者引入了自组织理论、复杂系统理论、耗散理论等概念，使得产业创新系统研究越来越复杂化，内涵和边界越来越不清楚。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逐步理清理论脉络，选择合理的研究方法，以清晰、明确的理论思路指导产业政策制定和技术创新实践过程。

3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体系的构建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需要紧密围绕科技创新政策、现实产业基础和创新生态理论体系三个维度，未来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3.1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问题的提出

在现阶段，我国产业发展特点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根据产业新特点的要求，需要在产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中引入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以揭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一般规律。

首先，产业竞争表现出新的特点。产业内部的竞争体现出生态学的特点，从单一产品模式和单一企业间的竞争，发展为以平台和技术标准为代表的企业种群与种群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其次，新的技术创新范式正在形成。产业创新系统正在由传统的线性创新、网络化创新，向整个商业生态模式的创新转化，从技术创新向全面的组织创新转化。

再次，产业的发展体现出演化特征。对于企业战略选择而言，不再仅仅是在静态产业环境中进行定位和选择，而是侧重于产业构架的治理，体现出与产业结构共同演化的特征。

最后，对于科技创新政策的新要求。产业政策目标不再是规模要求，而是良好产业生态系统的培育和建立。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未来研究需要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理解产业技术创新的发展过程以及一般规律，明确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现状与特征、作用机制、构建过程、政策有效性等内容。

3.2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外延研究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外延研究内容包括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定义、结构、层次、特征等。

首先，理论维度的刻画。关于如何刻画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产业情境的维度。从产业的动态形成，如新兴产业的发展来理解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2）竞争特征的维度。产业内部的竞争也不再局限于企业和企业之间，而是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种群和种群之间的竞争关系。（3）创新特征的维度。产业技术创新范式呈现出以“平台”为中心的特征，生态系统的成员可以利用技术平台、工具平台或服务平台提升自身的绩效水平。

其次，研究内容的变化。关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内容，从产业创新到部门创新，再到生态系统

创新, 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化。产业创新研究强调经济因素, 侧重产业内部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 目的在于构建有竞争力的主体; 部门创新系统强调社会因素, 侧重产业内部主体之间的非经济关系研究, 如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和非线性创新过程;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侧重动态性, 包括企业在系统中战略定位的动态性, 以及产业构架治理的共演特征。

最后, 演化过程的描述。在以往的研究中, 并没有说明如何建立创新生态系统, 及其是如何演化的。为了描述产业技术创新的建立和演化过程, 需要重新理解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以及产业发展的演化模式。关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在新的产业环境特征下, 组织是否在既定的外部环境下进行战略定位, 并展开市场竞争? 在产业融合环境下理解企业经营的整体结构, 以及形成企业如何在其中发展并取得领导地位的战略管理方法。

关于产业发展的演化模式。在新的产业发展过程中, 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企业群体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与推动,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特征和产业特征互相影响, 并在发展的过程中达到平衡状态。如苹果公司, 在此视角下要考虑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产品, 而是如何构建一个开发者、运营商、投资人和竞争对手都要考虑在内的生态系统, 作为系统里的平台领导者, 它需要设计协调一种利益分享模式。

3.3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方法

关于研究方法的构建, 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研究主要是生态学视角类比价值研究。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生态学的视角, 在结合生物学和组织理论研究的过程中, 需要正确使用类比的研究方法, 以便于从生物学获得更多的管理启示。类比研究方法的理论功能在于激发各种创造性思维, 以取得长期的、系统的研究成果。

类比方法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 主要通过其对于研究者系统的类比转换来激发出创造性。通过类比转化, 研究者能够从类比“源”采用或者借鉴理论结构和研究规范。

通过类比联系为组织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解, 其通过类比转化刺激新的知识开发。这种转化能够使得组织研究从其他研究领域获得新概念、假设、乃至理论。通过类比的方法能够提供依据理解 A 领域和 B 领域共享的某种确切属性和联系, 这种理解依赖于通过类比转化所揭示的客观存在的相似性, 并通过各种假设进行表达。

类比研究提供了许多对于组织理解的新视角, 其强调客观现象对于创造性思维的启发, 而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机械的塑造和形成理论概念与模型, 以及进行实证研究。

3.4 生态视角下产业技术创新范式研究

采用生态系统的视角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研究, 技术范式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企业如何在生态系统中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这些问题需要在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研究情境下, 进行详细和具体的探讨。

在生态学视角下, 组织所依赖的环境条件和联系得以明确, 也更容易理解组织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随着创新生态系统中资源流向的明确, 有助于帮助企业发现那些妨碍技术创新行为的约束、瓶颈以及潜在资源的位置, 帮助企业形成新的创新战略。在生态系统中, 随着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伙伴关系的形成, 企业技术创新的重点在于协调各种互补资源。企业会针对不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开发不同的运营模式, 实施不同的创新战略。如在有的系统中, 企业是核心企业, 采取技术主导战略; 而在有的系统中是辅助企业, 采取技术合作的战略。

3.5 产业技术创新系统建设政策支撑研究

在生态学视角下, 产业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技术创新的模式、过程和特征, 以及科技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目标的变化 (见表 2)。

产业技术创新政策如何更加有效，而企业如何开展对于产业结构的治理，两者的相互作用如何使得产业发展逐渐成熟，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

考虑到在生态学视角下，政策制定依据发生的变化，科技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内容应考虑从财政政策工具支持，向以技术平台为主的生态系统建设政策工具转化，强调生态规则的制定。具体的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可能包括：创新平台治理政策、技术联盟治理政策、创新生态治理政策。

3.6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风险管理政策

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的实施应有利于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企业规避各种风险。对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企业而言，存在技术发起者的风险、企业间相互依赖的风险、系统整合的风险。只有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机制，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才能够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

政策制定者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建立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组织模式的选择。政策对于创新系统的培育，涉及生态系统的治理机制。一个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应该是以主导企业为核心的集中模式？还应该是分散的开放模式？前者的例子包括大唐电信、苹果、微软等企业，后者则包括 LINUX 和安卓操作系统等企业。

第二，技术锁定的风险。行业内存在一个还是两个，或者多个创新生态系统才能良性促进产业的发展？生态系统多样性具有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作用，理论上讲创新生态系统同样具备多样化的基础。

第三，生态系统的风险。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在整个生态系统的供应链内，风险会随着产业链传递，并逐渐放大。

4 结论

通过对于相关文献的研究综述，本文提出了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研究的框架和内容。对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创新。

第一，有助于重新理解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在新的产业环境特征下，组织是否在既定的外部环境下进行战略定位，并展开市场竞争？在产业融合环境下理解企业经营的整体结构，以及形成企业如何在其中发展并取得领导地位的战略管理方法。

第二，有助于重新理解产业竞争的本质。本文认为，在新的产业竞争模式下，产业内部的竞争不再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个体间竞争，而是以企业生态种群为主体的群体之间的竞争。

第三，有助于重新理解产业发展的演化模式。在新的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于企业群体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与推动，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特征和产业特征互相影响，并在发展的过程中达到平衡。

对于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本文认为，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和难点。首先，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产业技术创新系统作为一个新概念，需要明确其定义和边界、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其次，与具体产业结合的创新生态系统类型研究。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研究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产业，发现特征明显的类型，讨论其产业含义。再次，生态视角下产业技术创新范

表2 创新生态系统对于支撑政策的要求

内容	产业创新模式	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的范围	技术创新：线性模型	组织创新：商业模式
创新的过程	内部研发为主	互补企业间的技术联盟
创新的特征	主导技术标准的形成	保持技术多样性和开放性
科技政策目标	集中主导产业	产业构架的治理
产业发展目标	产业规模	良性生态系统的建立

式的研究。从生态系统的视角研究产业技术创新，究竟能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新技术发展范式。最后，如何评价技术创新的效率。

作者：伍春来 赵剑波 王以华

来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 年第 7 期

标准化对我国物流产业 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物流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强不仅表明我国物流企业能战胜它国的竞争对手，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同时也意味着对与物流产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如制造业等）具有更强有力的“援助”作用，使其竞争力也能更上一层楼。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在国外较早可追溯到世界经济论坛于 1980 年开始的专题讨论，而国内起步于上世纪 90 年代（邓智团等，2010）。随着产业发展由过去的粗放型转向精致型，产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日益高涨，而作为科技结晶的标准对产业发展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1）标准作为技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的载体，从源头上控制了产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技术升级的主动权。掌握标准可使知识产权的持有者最大限度地控制生产成本，自主地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产业链环境，引导产业资源的动态分配，从而促进产业的升级（杜振华，2006），标准化是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必由之路（李太平等，2006）。

（2）标准也是进行国际贸易和消除技术壁垒的重要工具（Semerjian & Watters, 2000），在建立国际竞争优势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ANSI, 2000）。

（3）在宏观上，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核心环节，技术标准也成为产业技术竞争的制高点和政府产业技术政策工具（高志前，2004）。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事实的大背景下，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关键产业上的竞争，而产业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则主要表现为产业标准上的竞争（唐晓华、杨灵，2009）。因此，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正试图通过制定相应的标准化战略以获取产业国际竞争力（龚艳萍，2008）。

目前，产业标准化研究已有较丰富的文献资料。在理论方面，Veall（1995）指出标准可以促进企业间竞争，促进市场的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的发展。Gregory（2000）和 Swann（2000）都认为标准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四方面的积极作用：质量/可靠性作用、信息作用、兼容/协同作用和减少多样化作用。赵树宽等（2004）分别从“技术创新、产品成本、市场结构”等方面分析了技术标准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在实证方面，Swann（1996）实证分析了标准化活动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论是标准化能促进贸易发展和增强国家竞争力。德国标准化协会 DIN（2000）的研究发现，

在测量劳动力、资本、专利和技术标准对德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技术标准的贡献程度位于资本之后,同时也发现标准能促进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龚艳萍(2008)以相关分析和格兰杰检验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标准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关系进行实证,结果显示技术标准与产业国际竞争力高度相关,并且构成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原因。邓智团等(2010)同样以我国信息产业为例,研究技术标准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信息产业中的技术标准是构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物流标准对提升物流竞争力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兰洪杰等(2004)指出制约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其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滞后。王增梁(2008)通过调研发现我国绝大多数物流企业因实施了 ISO9000 标准进而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以及发展国际物流。李传荣(2006)认为我国物流产业标准化工作是实现其快速、高效和低成本的发展目标的基础。因此,雷勋平(2007)指出在我国正处在以由市场换取资本和技术向以市场换取技术和标准转变的重要时期,只要我们掌握了物流标准的主动权,就能提升我国物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上述成果对于本文研究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与标准化关系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但本文认为已有研究成果仍存在以下不足:

(1) 未见物流标准化与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关系的定量研究成果。虽然已见一般产业国际竞争力与标准关系的研究文献(杜振华,2006;ANSI,2000;赵树宽等,2004),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技术标准关系的成果(龚艳萍等,2008;邓智团等,2010),也见到了少量物流标准与产业竞争力关系定性视角的研究成果(兰洪杰等,2004;李传荣,2006;雷勋平,2007)。但由于以下原因:其一是物流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在产业分类体系中并未见其详细的划分方案,即哪些行业归入我国物流产业仍然有待于商榷,自然谈不上计量其国际竞争力;其二是由于物流产业标准本身发展现状令人担忧,虽然已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认识到其重要性,但由于物流产业涉及众多部门而使其发展速度相当缓慢,因此要获取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两者关系显得尤其困难。所以到目前为止仍未见物流产业领域的相关定量研究成果。

(2) 物流标准化的衡量指标存在不足。在标准化方面,大多数文献常用“标准数量”代替某产业的标准化水平,虽然“标准数量”具有一定的可用性。但本文认为,某产业的标准化活动除了用国际、国家的标准数量衡量外,还应当包括申请成立的标准化委员会、用于标准研究专项经费的数量以及体现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等(侯俊军等,2012),它们也是推动产业标准化的重要力量。

因此,本文尝试构建比已有研究文献更合理的标准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指标,实证分析我国物流产业标准化对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通过分析希望得到如下有用信息:(1) 标准化活动对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然后进一步分析在众多标准化水平的衡量指标中,哪些指标对其影响程度比较大。在此基础上,(2) 作为产业标准化工作引导者的政府,如何通过制定更加合理的物流产业标准化政策,以推动我国物流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2 标准化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

2.1 标准化促进产业技术创新

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而标准化活动有利于产业的技术创新:技术标准可以为整个产业的研发活动提供基本的技术框架,它影响到了产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进程,而且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效应,某产业因采用较高层次的标准后会对处于该产业上游或下游的产业产生积极影响,也促进了它们的发展;同时,由于标准与专利往往会紧密结合,产业链上的企业可以通过形成专利池、标准联盟等方式获取丰硕的市场收益,可以看出标准为新技术的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提供组织方式和发展空间(李哲等, 2010)。因此产业标准是企业间进行合作、创新的基础。通过围绕一个共同的技术标准进行合作研发与创新的欧洲数字蜂窝移动电话通信的网络兼容性标准(GSM)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Pelkmans, 2001)。

2.2 标准可改善市场结构、规范市场秩序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的钻石模型理论指出,一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是与其市场结构是否合理,市场竞争是否有序息息相关的(Porter, 1990)。标准的出现,使得产业内的企业必须按一定的标准为社会提供服务或产品,使产业竞争处于有序状态之下。另外,在产业内企业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谁采用的标准比较高将处于更强的市场竞争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会迫使企业加大创新的力度,实现标准创新进而推动市场竞争的格局向更合理的发展方向,即市场结构的合理化。

同时,从政府对市场监管的视角看,产业标准比较丰富将有利于政府管理的“有法可依”,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维护好市场竞争秩序。

2.3 标准成为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

一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是通过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对手竞争体现出来的。随着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对贸易阻碍作用的不断减弱,各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逐渐采用了以标准特别是技术标准为核心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作为限制进口的主要工具(Porter, 1990)。世界上如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凭借其自身在技术、经济上的优势,通过制订并实施各种苛刻的标准,实现限制它国的产品或服务进入本国。如美国从 2007 年 6 月 1 号起实施新的轮胎测试标准,若达不到该标准的轮胎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不能进入美国本土,已经进入美国市场的部分轮胎则要进行召回工作,这对出口到美国市场的轮胎生产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美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标准问题(徐建华, 2007)。

3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基于已有研究仅用“标准数量”作为产业标准化水平替代变量存在不能全面、真实反映我国物流产业标准化水平的不足,本文将物流产业标准化水平界定为国家、国际物流标准的数量(简称为“标准数量”,用“PZSL”代表,单位为“个”)、申请成立的物流标准化委员会(简称为“委员会”,用“WYH”代表,单位为“个”)、用于物流标准研究的专项经费(简称为“研究经费”,用“YJJF”代表,单位为“万元”)以及代表物流产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简称为“专利数量”,用“ZLSL”代表,单位为“项”)等四个方面。一般产业国际竞争力借助“RCA”(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竞争力来衡量(龚艳萍等, 2008; 邓智团等, 2010),但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原因本文选择了我国物流服务的“出口额”(简称为“出口额”,用“CKE”代表,单位为“亿美元”)作为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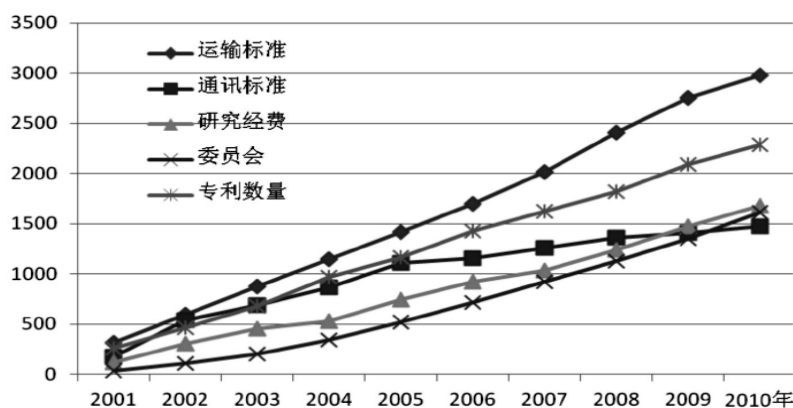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物流产业标准化现状

注:图中研究经费、运输标准和通讯标准、专利数量和委员会由于在数量级上不处于同一水平,为了能绘制到同一个图中,对委员会的数量进行了简单处理——图中的委员会数量为原始数量的50倍。

量指标。

本文采用 2001-2010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其中“标准数量”来源于工标网(<http://www.csres.com>),“委员会”、“研究经费”和“专利数量”均来源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存档文件(具体见图 1)。另外,“标准数量”、“委员会”和“专利数量”具体数据用的是存量,而“研究经费”用的是每年投入研究经费的数据。“出口额”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由于我国只对“运输、通讯”两项作服务贸易统计,而仓储、包装等其他物流服务业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的物流服务出口额仅包括运输和通讯二部分(具体见图 2、图 3)。

从图 1 可以看出,无论是标准数量、研究经费、专利数量以及委员会从绝对数量上看都是逐年增加,这说明我国物流标准化工作的投入是积极的,理应对我国物流产业发展壮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结合图 2 和图 3 的数据可知上述分析基本是正确的。另外,借助 SPSS12.0 软件对它们进行相关性分析也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标准数量、委员会、研究经费及专利数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921、0.836、0.892 和 0.911)。当然,上述研究结论是建立在直观统计数据分析基础上,物流标准化对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存在影响及影响响度有多大,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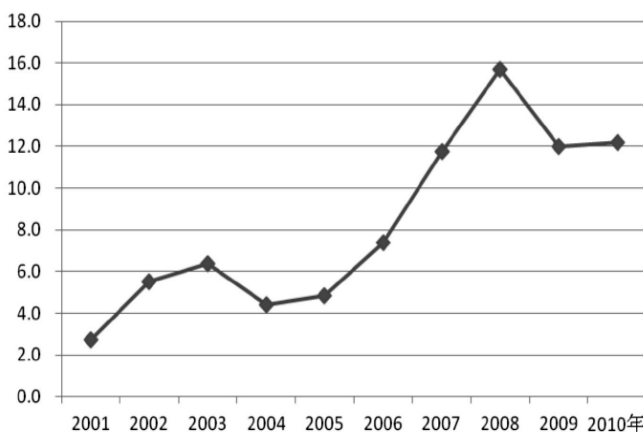


图 3 2001-2010 年我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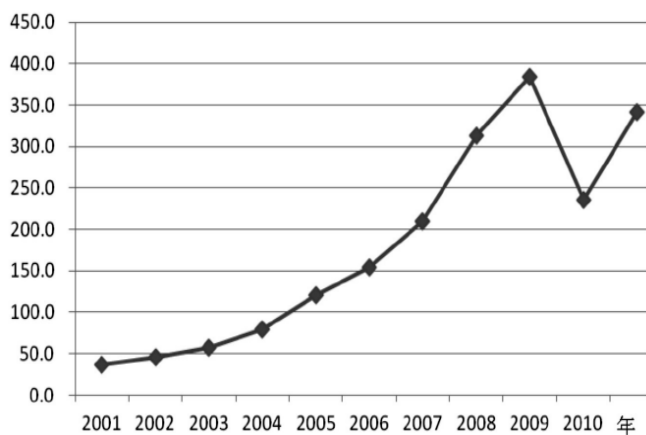


图 2 2001-2010 年我国运输贸易出口额

4 标准化对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

为了更全面地揭示物流标准化工作对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本文接下来拟构建三个多元回归方程,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物流总出口额(用“TotalCKE”代表)”、“运输业出口额(用“TransportCKE”代表)”和“通讯业出口额(用“CommunicationCKE”代表)”,分别从总体、运输和通讯部门三个

视角分析我国物流标准化总体上及其部门对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

另外,影响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除了标准因素外,还应当考虑产业竞争力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张新国,2007),因此,用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简称“生产总值”,用“AverageGDP”表示)代表我国物流产业所面临的经济体制及宏观经济环境。因为我国的生产总值越高,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将越大,物流产业面临有利的宏观发展环境,从而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用外商直接投资(简称“外商投资”,用“FDI”表示)代表流入我国物流产业的外资数量。FDI 数量越大出口贸易越发达,而这对促进物流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是有积极作用的。“AverageGDP”和“FDI”作为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其数据均来源于我国统计局网站的统计数据。

4.1 物流标准对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总体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回归方程(1)从整体上分析我国物流标准对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以期从整体上考察两者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1

$$\begin{aligned} \log(TotalCKE_t) = & C + \beta_1 \times \log(PZSL_t) + \beta_2 \times \log(WYH_t) + \beta_3 \times \log(YJJF_t) + \beta_4 \times \\ & \log(ZLSL_t) + \beta_5 \times \log(AverageGDP_t) + \beta_6 \times \log(FDI_t) + \varepsilon_t \end{aligned} \quad (1)$$

从表1 可以得知,总体上我国物流标准化工作对物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表1 中国物流标准对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T 统计值	P 值
C	0.215	2.223	0.0032
β_1	0.813	1.263	0.0011
β_2	0.295	0.167	0.0041
β_3	0.282	1.251	0.0001
β_4	0.525	1.365	0.0021
β_5	0.642	3.632	0.0000
β_6	0.134	2.121	0.0001
调整 R^2	0.963		
F(sig)	33.531		

用。具体来看,“标准数量”对“出口额”的影响力度为最强,达到0.813,即我国物流标准的存量每增加1%,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将提升0.813%,这说明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物流标准,对于我国物流企业技术创新、物流市场竞争规范及提供更高质量的物流服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影响程度位列次席的为“专利数量”,影响系数为0.624,但“委员会”和“研究经费”对“出口额”影响程度却不高,影响系数分别仅有0.295 和0.282,前者说明我国物流标准化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物流标准化工作的组织、协调”等作用,当然这与物流产业是个新兴产业(产业边界划分不清晰)有一定关系。一般理论分析认为,物流标准的研究经费投入越多,可制订出更科学、高质量的物流标准从而有力地促进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本文的实证结果却显示“研究经费”对“出口额”的影响程度不高,可能的原因是“研究经费转化成物流标准”的转化效率不高,存在着较高的资金浪费或使用不当。另外,“生产总值”对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比较大,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地发展,确实有利于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壮大;FDI 对“出口额”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进入我国物流产业的FDI 并未起到促进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效用,这也许是在我国大量发展服务业进程中,在急于大力发展物流产业的心态下和地方官员GDP 绩效考核的重压下,可能会降低引资的门槛,重视FDI 数量过于其质量,出现物流产业FDI 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对产业效率的提升却没有多大影响的现象。

在总体分析后,本文接下来分别就我国物流产业的运输业、通讯业的国际竞争力与物流标准关系进行分析。

4.2 物流标准对我国运输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begin{aligned} \log(TotalCKE_t) = & C + \beta_1 \times \log(PZSL_t) + \beta_2 \times \log(WYH_t) + \beta_3 \times \log(YJJF_t) + \beta_4 \times \\ & \log(ZLSL_t) + \beta_5 \times \log(AverageGDP_t) + \beta_6 \times \log(FDI_t) + \varepsilon_t \end{aligned} \quad (1)$$

从表 2 可以看出, 运输标准 (TransportPZSL) 对运输行业的“出口额”影响比较大, 达到 0.757, “专利数量”位列第二, 达 0.585。“委员会”和“研究经费”对运输行业的“出口额”影响仍然比

表 2 中国物流标准对运输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T 统计值	P 值
C	0.316	2.013	0.0000
β_1	0.757	3.038	0.0011
β_2	0.231	1.602	0.0022
β_3	0.202	2.218	0.0001
β_4	0.585	6.372	0.0000
β_5	0.431	3.106	0.0010
β_6	0.202	12.201	0.0011
调整 R^2	0.977		
F(sig)	24.535		

较小, 而“FDI”对运输行业的“出口额”影响仍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数据表明: 与总体分析类似, 运输业标准对运输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制订且采用更多、更高质量的运输业标准, 可以提升我国运输业的国际竞争力, 当然, 不同的标准衡量指标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

4.3 物流标准对我国通讯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log(\text{CommunicationCKE}_t) = C + \beta_1 \times \log(\text{CommunicationPZSL}_t) + \beta_2 \times \log(\text{WYH}_t) + \beta_3 \times \log(\text{YJJF}_t) + \beta_4 \times \log(\text{ZLSL}_t) + \beta_5 \times \log(\text{AverageGDP}_t) + \beta_6 \times \log(\text{FDI}_t) + \varepsilon_t \quad (3)$$

从表3 可以看出, 虽然通讯行业的回归系数与总体及运输行业有一定的差异, 但从趋势看标准对通讯行业的影响与对总体及运输行业的影响相似, 即物流标准对我国通讯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程度按大到小分别为“标准数量”、“专利数量”、“委员会”和“研究经费”, “FDI”仍然不对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不产生影响。

表 3 物流标准对中国通讯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T 统计值	P 值
C	0.523	10.613	0.0021
β_1	0.425	5.773	0.0011
β_2	0.231	2.776	0.0000
β_3	0.202	1.679	0.0011
β_4	0.314	4.322	0.0010
β_5	0.431	3.106	0.0000
β_6	0.202	2.621	0.0001
调整 R^2	0.928		
F(sig)	21.327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分别用我国运输行业和通讯行业的标准存量、申请成立的物流标准化委员会数量、用于流标准研究的专项经费以及代表物流产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四方面指标来衡量我国流产业的标准化水平,并作为解释变量。选择我国物流服务的“出口额”作为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别从总体、运输行业和通讯行业三个角分析我国物流标准化对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物流标准化工作有地促进了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表现为物流服务贸易年出口额都在不断增加。当然“标准数”、“委员会”、“研究经费”和“专利数量”对我国物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程度是有差异,“标数量”和“专利数量”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委员会”和“研究经费”的影响相对较小。

5.2 政策建议

(1) 提升我国物流产业的专利、标准化水平。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专利和物流标准对提升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提高我国物流产业的专利、标准化水平有助于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进而提高其国际市场占有率。由于物流企业具有提高市场占有率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偏好,因此,物流企业是物流标准化工作的主体,当然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的政府也有宏观引导的职责(如政府需要在对参与物流标准化工作特别是制订、修订物流标准的企业在税收、融资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所以要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引导为辅开展我国物流专利、标准化工作,将代表技术创新的专利融入标准中,积极参与国际物流标准的制(修)订、提升我国物流产业的专利、标准的数量及其质量,增强我国在物流服务市场的话语权。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普及,我国物流标准的信息化工作也需要引起各物流企业、各级物流标准管理机构的重视。“会议+纸张”的传统标准化管理工作模式存在着效率低下、周期长和投入资源大等不足,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物流标准化工作的深入开展。利用互联网进行物流标准的在线浏览、信息发布乃至在线投票的物流标准化工作的“电子化、网络化”将是未来我国物流标准管理工作的新模式,它可大大提高物流标准化工作的效率、缩短工作周期以及节约研究经费。因此,各级领导和每一位物流标准工作者,要切实转变观念,不断学习新理论和新知识,掌握现代科技手段以支持我国物流标准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电子化手段进行物流标准化文件的起草、协调和意见处理,以提高我国物流标准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2) 在增加我国物流标准化研究工作的经费投入的同时,迫切需要提高其使用效率。

实证结果并不支持标准化的“研究经费”对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积极影响的假设,这可能与我国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监管体制不完善有关,因为如果使用效率、监管体制没有问题的话,研究经费投入越多,其产出(物流专利、物流标准)将越多,而专利、标准对提升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有帮助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只对项目申报时的研究经费设计(所需研究经费数额或多或少、使用项目的是否科学)是否合理进行关注,而一旦科研项目申请成功,研究经费如何使用、使用效率等环节的监督比较放松。因此,虽然我国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很大,但由于监督不到位存在着较大浪费的原因,科研成果(产出)数量不多、品质不高,所以,要想提高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除继续加大其研究经费的投入外,更为重要的是实行标准项目研究经费改革,根据完成报批国家标准的质量和难易程度拨付经费,突出重点,建立经费使用跟踪管理制度,使研究经费效率最大化。同时,可以考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开辟国家标准制修订的新途径,鼓励企业承担、出资制订国

家标准，推进资金投入的多元化。

（3）发挥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国家物流标准制修订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

虽然数据显示物流标准“委员会”并未对我国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起到积极作用，但本文认为我国各物流标准委员会对我国物流标准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因此，各物流标准委员会要主动发挥作用，协调配合，通过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进而推进我国物流标准化工作：一是全力做好我国物流标准的清理整顿工作。由于我国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物流产业标准分布于多个产业内，现要把它们分别从已有的产业内剥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物流业，因存在着利益重新分配问题难度相当大。所以各物流标准委员会要从认识、机制和机构上做好充分准备，保障国家标准清理整顿工作按要求完成；二是加强物流业标准委员会内部管理。各物流标准委员会要积极推进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以提高委员会内部运营绩效；充分发挥委员会成员的积极性，积极探索有利于标准委员会高效率运作的新机制；三是积极参与物流的国际标准化活动。在培养国际标准化活动专门人才工作方面要有强烈的意识，通过提出切实可行的物流标准化工作计划，认真落实国家标准委有关推进实质性参与物流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各项措施；四是进一步加大采标工作力度，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要对物流产业领域内国际标准的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制订并逐步实施相应的物流国际标准转化计划，提高我国物流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成为国际标准以提升我国物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张宝友 朱卫平

来源：《上海经济研究》2013 年第 6 期

技术经济理论在施工成本控制中的应用

技术经济及管理



施工项目成本控制，是施工企业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在保证工期和满足质量要求的前提下，采取的把成本控制在计划范围内，并进一步寻求最大程度的成本节约的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四个方面。技术措施不仅对解决施工成本管理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纠正施工成本管理目标偏差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笔者对成都市某工业厂房的设备安装进行了分析，对该工程成本控制的技术措施进行了归纳总结。该工程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工程类别为 A 类，由 8 栋 1~3 层的钢结构车间组成，科技含量较高，安装系统非常多，安装工程总造价 6.92 亿，多数为高空作业，施工质量要求严格，工期要求短，每栋厂房的安装工期仅为 45 天。同时，厂区内分厂众多，各种能源需按分厂分别计量。因此，施工进度控制、质量控制以及能源的智能控制、计量控制成为本工程的难点。

1 编制先进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是对施工活动实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是用来指导施工项目全过程的规划性、全局性的技术经济文件。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目的在于提高质量，加快工期，降低成本，提高项目施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施工组织设计是施工活动高效、有序、科学、合理进行的保证。

该工程由于工期特别短,周密的计划尤为重要。所以,施工单位编制了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用以指导施工的全过程。这一施工组织设计详细制定了以下内容。

1.1 组织机构方案。

采用直线职能制组织形式,设置三个管理层次,一是施工项目经理部,负责项目决策管理和调控工作;二是施工项目专业职能管理部门,如技术组、质控组、进度组、预算组等,负责施工项目内部专业管理业务;三是施工项目的具体操作队伍,如通风空调施工班组、给排水施工班组、电气施工班组等,负责项目施工的具体实施。同时,明确了各管理层次、部门的职责及其相互关系等。

1.2 人员配备方案。

包括项目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各专业负责人等,同时,制定了各类人员的职责。

1.3 技术方案。

针对平行交叉作业较多的情况,为使各施工工种相互配合、保证施工质量和保护成品,在制定兼顾工艺先进和经济合理的施工方法的同时,还确定了详细的施工程序、施工顺序与工艺流程、关键技术预案、重大施工步骤预案等,避免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种交叉而使人力、物力、时间多余消耗,导致成本增加。

1.4 进度方案。

包括总进度计划、周进度计划及周进度检查计划。绘制网络图,确定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避免由于进度拖延导致成本增加。

1.5 安全方案。

包括安全总体要求、施工危险因素分析、安全技术措施、重大施工步骤安全预案等,避免由于安全事故导致成本增加。

1.6 材料供应方案。

包括材料用量计划、材料供应流程、材料进场验收流程、临时(急发)材料采购流程等,确保材料计划准确,及时供应,不积压,不欠缺,避免资金浪费。

该施工组织设计应用流水施工组织方式以及网络计划技术,对施工中人力、物力的供应与消耗、专业施工与工种协作、关键工作与辅助工作、空间布置与时间安排等方面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部署,为协调各单位、各工种以及各项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依据,为建筑产品生产的节奏性、均衡性和连续性提供了最优方案。

2 进行三级技术交底

三级技术交底就是项目技术交底、专业技术交底和班组技术交底。

2.1 项目技术交底。

工程开工前,进行项目技术交底,即在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和总监理工程师主持下,由设计单位承担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对建设单位工程管理人员、监理单位有关人员、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及主要技术人员进行全面技术交底。主要内容有:设计的主导思想、采用的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质量保证措施、建筑材料要求、易发生质量问题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技术要求、图纸会审中提出的有关问题及解决方案、施工进度和总工期等。

2.2 专业技术交底。

专业技术交底,即在各专业承包单位组织和专业监理工程师主持下,由各专业监理工程师和各专业技术负责人对有关技术人员、施工班组长、监理员等,按照已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技术交底。主要内容有: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方案、质量保证措施及应急预案;关键工程与交叉作业工程如何协作配合,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工艺的衔接;施工单位初次采用的新结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

2.3 班组技术交底。

班组技术交底是由施工班班长对一线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主要内容有: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方法及注意事项、流水和交叉作业施工阶段划分、关键工序的材料选用要求、施工机具设备选用要求、施工作业条件要求、施工工艺、施工程序、施工顺序等。

技术交底使施工人员对工程特点、技术质量要求、施工方法与措施等有一个较详细的了解,有利于科学地组织施工,避免技术、质量事故的发生。

3 进行系统的安全交底

针对该工程工期紧、工种交叉作业多、高空作业多、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特点,施工单位制定了系统的安全交底制度。

第一,工程项目开工前,由施工组织设计编制人向参加施工的管理人员(包括分包单位现场负责人)、班组长进行施工组织设计及安全技术措施交底。

第二,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由方案编制人会同安全员将安全技术措施、施工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安全施工注意事项等向参加施工的全体管理人员(包括分包单位现场负责人)、作业人员进行交底。

第三,每道施工工序开始作业前,专职安全员向班组长及班组全体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第四,新进场的工人参加施工作业前,由项目部安全员及项目部分项管理人员进行工种交底。

第五,每天上班作业前,班组长负责对本班组全体作业人员进行班前安全交底。

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完毕后,所有参加交底的人员均履行签字手续,施工负责人、生产班组、现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三方各留执一份,并纪录存档。

安全交底让一线作业人员了解和掌握该作业项目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有助于减少因违章操作而导致的事故的发生。

4 严把质量关

首先,所有原材料、元器件、设备等均须进场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需要复验的材料须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其次,选择那些施工过程中的关键工序或环节以及隐蔽工程;施工中质量不稳定的工序、部位或对象;对后续工程施工或对后续工序质量或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工序、部位或对象;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部位或环节,将其设置为质量控制点。对质量控制点不但制定质量预控措施,而且在施工中实行三级质量检查制度,即班组自检、质量员专检、监理工程师检查。只有上道工序被确认质量合格后,方能准许下道工序施工。

上述质量控制措施的实施,杜绝了返工现象,缩短了验收时间,节省了费用开支。

5 采用新工艺

由于各专业管线多,且各专业单独承包施工,为避免管线支架各自为政,增加施工成本,该工程各专业管线采用当时属于先进工艺的共用支架,由项目经理部对共用支架安装方法进行规定,并进行强度计算。该工艺优化了管线布局,工艺实用有效,既美观,又节约成本。

总之,各项技术措施的采用,大大降低了人工费的消耗,机械、检测仪器的使用台班和材料的消耗也减少了,与以前相比,该施工单位施工工艺节约成本 25%,工时节省 30%同时,质量情况有显著的提高,相关质量问题的返工率减少 25%。

作者:曹亭心

来源:《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 年第 3 期

关于《银行会计学》课程教学实践的思考



《银行会计学》历来都是财经类院校金融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在内蒙古财经学院金融专业的开设时间也已近 30 年之久。期间随着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从收付记账法到借贷记账法、从手工操作到电子记账的巨大变迁,相应的教学内容与手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学校于 2006 年引入“现代商业银行会计业务模拟系统”软件后,目前已实现了由纯理论性教学到理论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转变,为培养兼具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银行专业人才提供了重要的教学支撑。

这样一门可谓历史悠久的课程,但在教学实践方面的探讨鲜有问津。本文分析了多年来实践教学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此来进一步推动本课程的建设与完善。

1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多年的实践教学中,《银行会计学》课程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教学体系与方法,但一些客观与主观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教材内容难以及时反映银行会计业务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制度变迁,银行会计在确认、计量、记录与监督等都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银行会计特别是商业银行会计业务的动态性与时效性非常强。但目前出版的各类银行会计教材对这个特点的反映不够,新版教材虽有变化但都调整不大、新增的内容并不多,比如将现在已较少使用的手工联行业务常常用大段的篇幅进行介绍,而对银行日常使用的电子联行的介绍却语焉不详,再有对银行在不同情形下处置抵押与质押物的核算、住房按揭的核算、金融资产的核算等等,都没有详细纳入到教材内容中,在此情况之下,如果单纯依托教材,一方面学生所学知识难以得到及时充实和更新,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1.2 理论教学中缺乏明显有效的手段突破传统的讲授型教学模式。

本科会计课程的理论教学常常是对会计业务核算过程的介绍,也就是仅限于解决“是什么”,而基本上不会深入发掘“为什么”,这种介绍性的特征就使得《银行会计学》的课堂教学极易形成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型教学模式,这种传统的模式虽然有助于帮助学生新知识、扩展概念体系,培养其倾听和思考的习惯,但却经常导致课堂氛围较为呆板、与学生的互动性不够等问题。尽管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的引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但当课件的制作水平较低时,依然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会计教学中经常提到的案例式教学,也仅仅限于会计习题的讲解,难以达到在分析案例中激发学生思考并形成互动的效果;而课堂讨论式教学至多也就是限于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评估这样传统的结构流程,结果往往是老师自言自语,学生应声附和。

1.3 实践教学仿真模拟过程简单,效果有待提高。

会计实践教学是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相关理论基础之后,在实验室让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际,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模拟仿真训练,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但在实际操作中,模拟仿真的情境过于简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相关的配套纸质材料,如各种存贷款凭证、结算凭证、账簿和报表等。在银行会计日常业务中,完整的流程与组织包括接收、审核凭证、填制凭证开始,然后据以记账,最终完成报表三个环节。而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由于没有配套的纸质凭证,第一个环节就被省略掉了,第三个环节中的报表又是由系统自动生成的,而且在实验室目前是无法输出纸质报表的,所以学生能够体会到的实际上只限于电子记账这个环节,这就导致学生并不能通过业务处理中的纸质凭证、账簿与报表来梳理当天的业务,也就难以真正领悟到银行会计的操作流程,实验的效果也大打折扣;二是受软件本身设计的约束,实验内容基本上属于单机操作,因而业务内容的设计相对简单,特别是对于结算业务的模拟效果较差,学生依然难以从中体验到一笔结算业务的完整流程;三是实验内容单一。现在的实验内容实际上只是部分电子记账业务的简单操作,银行会计中的其他技能如点钞、假钞识别、小键盘录入、凭证装订等都没有涉及,而这些技能是从事银行会计工作应具备的基本技能。

1.4 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

会计实践教学能使熟悉银行会计工作的全貌,提高实践能力,巩固理论知识。但在教学中实践环节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银行会计的实践教学还不是独立的考核课程,只是作为银行会计课程的课内实验,课时占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考评也只是构成银行会计成绩的 20%,这种课程设置实际上是把实践教学仅作为理论教学的延伸和补充,甚至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教学环节,这样就容易导致教师和学生对于实践教学的轻视,这也是实践效果一般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优化教学效果的建议

2.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打造具有复合型知识的银行会计教学团队。

银行会计的教学内容融合了金融、会计及相关法律知识,因此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学科知识特点,所以对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要求就比较高。只有财会知识背景的,往往不能把相关的金融知识贯穿始终,因而对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说容易产生知识割裂的感觉;只有金融知识背景的,又难以讲深、讲透相关会计业务的内涵与实质,因而对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说又容易产生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同时,如果对《担保法》、《票据法》等法规没有深入研究,在贷款业务、支付结算业务等内容的讲解上容易忽略相关法律涵义,而这样的法律含义恰恰是理解并区分不同担保贷款、不同票据的核心。所以教师在上岗前应经过一定时间的金融、会计甚至法律相关专业的知识培训,这样才能做到查漏补缺以更好地胜任这门课程。

2.2 把握理论前沿和实务新规, 实时更新教学内容。

银行会计课程的动态性特征, 主要是源自我国当前金融、会计领域的相关制度的变迁。当教材内容不能及时地反映这种变迁时, 就需要教师敏锐把握相关信息, 对已经变化了的或废弃的内容及时更新, 并不断补充新的信息。为了做到这一点, 要求教师在日常的教学要大量收集最新资料以增强课程内容的实务性与时代性; 同时教师应通过加强自身的科研水平来把握相关领域的前沿学术成果, 并把研究过程中获取的前沿信息反映到教学内容中。

2.3 探索课堂教学手段与模式改革, 增强教学的生动性、互动性与思辨性。

随着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普及, 学生已经对这种教学手段已习以为常, 为了吸引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 一是应努力提高课件的制作水平, 在保证内容系统性的前提下, 可以尽量减少文字的单调描述, 而代之以图片、图表或动画等形式进行展示。比如在支付结算业务一章中应以简洁的流程图形式代替繁冗的语言进行讲解, 特别是通过动画的设置可以使学生清晰地了解一笔结算业务的来龙去脉; 另外在适当的情境中加入一些生动的卡通人物或动漫也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二是探索营造开放式的宽松氛围, 围绕案例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变单调的“教”为“教与学”。比如绪论中关于商业银行的介绍, 可以发挥金融专业学生的专业特长, 要求学生自行搜集资料用 PPT 的方式进行演示, 老师对学生的演示内容只起补充说明的作用; 再如联行业务一章的学习, 可以联系山西票号的兴衰加强学生对联行专用工具的理解, 期间可以以课堂讨论的形式进行学习。三是建立健全对学生的课堂评价体系, 以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使教学模式的创新得到学生的认可和巩固。

2.4 充实实践教学内容, 完善实践教学形式。

目前实验室引进的银行会计业务模拟系统是以电算化的形式来训练学生的技能, 但这种形式实际上偏重于学生的操作技能, 并不能达到让学生理解银行会计证、账、表勾稽关系的目的, 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理论教学的内容。所以银行会计实践教学应首先从手工实践开始, 训练学生填制、审核与记录的基本会计技能, 这样才能清晰地了解并体会银行日初、日间和日终业务处理的全部流程。这就要求教师要设计一套体系上具有严密性、内容上具有针对性的实验教材, 并通过实践不断加以完善。在此基础上, 再通过模拟系统软件进行电子化操作, 势必才会起到更好的效果。除了训练学生的会计技能外, 针对银行业务的特殊性, 还应该有一定的时间训练学生在点钞、识别假钞、小键盘等方面的技能, 这样的教学不仅能拓展学生的实践技能, 而且还会大大激发学生对实践教学的兴趣。

2.5 重视实践教学, 改进实践教学体系

培养兼具理论与实践能力的金融人才是该校金融学院的最终培养目标, 而《银行会计学》是具备仿真模拟教学条件的为数不多的课程之一, 所以应尽快转变对实践教学的认识, 把银行会计业务模拟设计成一个独立的教学环节来进行全面建设, 在课程设置、实践内容、考核评价等方面重新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银行会计课程的特点, 培养出具备一定实践技能的金融人才, 从而增强学生的未来就业优势。

作者: 王海霞

来源: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11 年第 9 卷第 3 期

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异象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分析



1 引言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基金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另一种现象却日益引起基金公司的注意,即基金业绩越好,出现的赎回率越大。这一风险首先是由开放式基金的内在属性决定的,由于开放式基金允许投资者随时申购和赎回基金份额,基金管理人无法决定投资者的赎回行为,无疑这不利于基金管理人更好的管理基金份额,相反会迫于流动性风险,而放弃好的投资机会,或低价处理现有的资产,最终导致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双亏”。本文拟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分析目前我国开放式基金市场上出现的这种赎回异象,尝试从人的心理角度研究这种异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一些思路尽可能抑制这种异象的发生,以期促进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健康发展。

2 文献综述

Roston(1996)认为,投资者选择基金的主要依据是基金的历史业绩。如果该基金的历史业绩一直比较好,即使当期业绩不好,投资者也倾向于将这种结果归为运气不好,不会马上赎回该基金,也就不会带来大量的资金流出;而对于以往业绩一般的基金来说,即使当期取得了很好的投资业绩,投资者也倾向于认为运气使然,为了避免将来业绩下降,会马上赎回基金,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出。他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持续业绩良好的基金来说,基金业绩的增长所带来的资金流入效应远远大于资金流出效应,导致基金规模的不断增大。

Tufano(1998)的研究也发现优秀的基金业绩会导致大量的新资金流入,基金收益和基金流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基金业绩越好,赎回率应越低甚至出现净申购的局面。

姚颐、刘志远(2004)对2002年12月至2004年3月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赎回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基金业绩增长、分红金额、分红次数、基金管理公司规模、基金集中度是影响基金赎回的重要因素,得出了赎回率与基金业绩增长正相关的结论,即随着基金业绩增长,赎回率不降反升。

3 心理分析

本文主要参考Kahneman等人提出的一些非线性效用理论,结合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和分析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的异常现象。

3.1 处置效应和展望理论

展望理论是Kahneman和Tversky在1979年提出的,它和期望效用理论的效用函数不同,展望理论把价值函数 V 定义成相对于参考点的盈利与损失,而不单纯是绝对的最终财富。展望理论假定对应于盈利的价值函数是凸的,而对应于损失的函数是凹的。大多数投资者在入市时都有一个心理基点。当市场处于熊市的时候,相当多的基金净值徘徊在面值之下,此时基金净值低于很多投资者的主观的参考点,投资者不愿放弃已经亏损的基金,决定继续持有。也就是说发生损失的基金持有人不愿意通过赎回他们持有的基金来面对投资失败的事实,表现为风险偏好。同时,由于此时参考点可能已经很

低并且已被长期套牢。投资者就会有业绩一上升就要赎回的心理预期,因此,当基金资产净值上升,即高于参考点之后,投资者由于面对确定的收益和不确定的未来走势时,为了避免基金资产净值下降而带来的后悔,他们更愿意将已有的盈利兑现,表现为风险厌恶。“处置效应”的长期存在,诚然有我国基金市场发展时间不长、投资者经验不足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目前暂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心理预期,而我国基金投资品种的匮乏,基金持股的高度集中,部分重仓股的高位徘徊,也使投资者产生各种心理偏差。

3.2 羊群行为和噪声交易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往往需要经过复杂的搜寻过程,甚至借助于各种外部线索和辅助工具,才能完成提取信息的任务。因此在短期交易普遍存在的现实状况下,使得噪声交易可能聚集在某些易得信息上,而这些信息可能是一些垃圾信息或谣言。它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价格的明显偏离。当大量的交易者聚集于某一信息并发生极端反应的时候就会导致“羊群效应”。羊群行为是群体投资者基于系统性认知偏差而导致的一种跟从性的典型行为。我国开放式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以个人为主,他们的投资行为较为短期,很容易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而更改投资计划,当大量的噪音交易者聚集于某一信息并发生极端反应的时候就会导致“羊群效应”。此时赎回业绩好的开放式基金以实现收益表现为整个市场的“卖盈留亏”。

3.3 过度自信等投资者情绪

Mann(1992)认为,投资者每天的心情和情绪都会影响到他们对风险的认知和选择。Wright & Bower(1992)研究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好心情的投资者相比较具有坏心情的投资者来讲,对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会过分乐观。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在我国投资者身上的反应更为敏感,由于资本市场的相对不完善和投资者素质相对不高,造成了人们的过度自信,在交易中更容易受到情绪等外来因素的影响,想当然的认为前期业绩好的基金,后市上涨的空间更小,而那些业绩差甚至亏损的基金更容易迎来反弹的机会。另外,大多数非理性的投资者在面对损失的时候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他们把这一损失归结为暂时的回调,从而导致业绩较差的基金赎回率相对较低的现象。

4 总结和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可以从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两方面来降低这一异象发生的频率。首先,从投资者角度,应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要把基金作为短期资金的存放形式而频繁进出;其次,从基金管理公司的角度,加大分红的力度,给予投资者更多“看得见的收益”,同时由于分红降低了基金净值,既减少了投资人赎回的可能性,又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吸引投资人的申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赎回的压力。

作者:周丛丛 黄辉

来源:《金融经济》2010 年第 13 期

国外组织创新搜索研究述评



演化经济学认为,在过去30多年的组织理论当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搜索行为是否会赋予组织一种选择优势。Cyert和March认为搜索是支撑组织解决问题和适应环境变革的基础。作为一个流程,搜索行为也许产生于组织对环境的适应并促进学习。因为对环境的适应一般产生于对环境变革的回应,而学习行为必然包含组织对新技术的开发,所以通过搜索行为获取的那些成果将促进组织惯例的变革并能减少组织失败的风险。换言之,搜索在组织演化和环境适应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为应对由环境变革引起的机会和威胁,管理者需要分配资源于搜索活动。

特别在开放的创新环境中,Chesbrough认为开放的创新者往往会通过部署通向市场的外部通道(如同内部研发)搜索企业外部的创新思想并使其商业化。因为创新过程的核心部分涉及的是搜索具有商业潜能的新创意。企业经常投资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其他资源用于搜索新的创新机会。这种投资提高了企业创造、使用和重组新的和现有知识的能力。类似地,Fabrizio也强调,企业通过投资于某种创新搜索活动,能提高他们的能力和创新绩效。因为,一个企业动态的搜索(或解决问题)能力是企业资源异质性的重要来源,尤其对新技术的搜索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对于创新搜索会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和创新绩效取得了共识,但对其内涵界定及测量维度均按各自研究目的来阐述,且研究的主流在于更多地强调搜索的范围特别是远程搜索的重要性,较少研究同时关注于创新搜索的两个不同维度即搜索的范围和深度。而且,关于搜索的范围和深度的平衡问题以及影响创新搜索的主要因素也成为学者讨论的焦点。

1 创新搜索的内涵与分析维度

先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创新搜索的两个概念,本地搜索和远程(探索性)搜索。本地搜索的组织通过使用与已存在的知识基础密切相关的知识解决问题。

在这个范围的另一端,探索性的搜索行为涉及改变现有的组织惯例和知识基础的有意识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这种本地搜索和远程搜索及其平衡问题可进一步从职能领域(function domain)即价值链的不同活动环节或知识距离领域(knowledge distance domain)即知识的新旧和熟悉程度两个视角来分析。而Lavie, Kang和Rosenkopf则指出如仅从职能域不同环节的分离来探讨本地搜索和远程搜索及其平衡问题意味着组织资源分配的折中,这将会导致组织惯例冲突并进一步破坏组织绩效,因此他们从职能域和结构域(新的与旧的合作者)视角探讨了本地搜索和远程搜索及其平衡问题,并指出如在职能域进行本地搜索同时在结构域进行远程搜索可克服上述障碍。目前,众多文献对创新搜索的范围进行了大量研究,虽然根据范围对创新搜索的传统描述是有用的,但还是不完整。因为,企业搜索的努力不仅变化在搜索的范围(本地—远程),而且还在于它们的深度即搜索活动的强度。在搜索新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某些企业可能重复使用一些他们熟悉的现有知识元素,而其他企业可能仅有一次使用这些知识元素。在搜索深度方面的这些差异可能导致熟悉这些知识元素的程度不同并最终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下文将从实际存在的两种不同潜在的搜索维度即深度和范围,以代替远程(探索)和本地(挖掘)之间平衡的单一维度的描述,回顾创新搜索的内涵与分析维度(表1)。

表 1 创新搜索的内涵与分析维度

研究者(年份)	分析维度		内涵简述
	搜索范围(或宽度)	搜索深度	
Sea Jin Chan(1996)	广泛搜索集中搜索	/	与组织当前惯例评价相关的并导致其改变甚至急剧变革或者被替换的那些组织活动
Rosenkopf & Nerkar(2001)	本地搜索 激进式搜索 跨越内部技术边界搜索 跨越组织边界外部搜索	/	组织搜索解决问题方法的行为
Ahuja & Katila(2004)	科学搜索 地理搜索	/	组织在本地搜索中面临技术竭尽和要求超越本国市场扩张时的搜索新知识和机会的行为
Sidhu, Commandeur&Volberda (2007)	供应维搜索 需求维搜索 地理维搜索	/	组织为发现新的技术、产品和业务方法,寻求新知识和试验新的可供选择的机会,从远程到本地搜索信息或知识的行为
Grimpe & Sofka(2009)	市场知识搜索 技术知识搜索	/	对组织外部有用新知识的搜索行为
Fabrizio(2009)	搜索质量 搜索速度	/	跨越可能新组合多维空间的一个不确定的过程
Katila & Ahuja(2002)	搜索范围	搜索深度	组织解决问题的活动,它涉及技术构念的创造和重新整合
Laursen & Salter(2006)	搜索宽度	搜索深度	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利用外部的知识来源,以创造技术和知识新组合的行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参考文献整理。

1.1 创新搜索的范围

目前众多学者一般从知识距离领域的认知、时间和空间三个独立维度分别或同时着手于创新搜索范围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强调本地搜索和远程搜索对组织均很重要,认为组织创新很大程度上通过现有知识和新知识的整合,因为探索、挖掘和整合企业的现有知识和外部获取的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公司往往能获得竞争优势。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在开放环境中企业应该通过远程搜索不断从外部获取新的思想、见解和技能,以扩大其现有的技术知识基础、不断掌握尖端技术并保持柔性。

(1) 强调本地搜索和远程搜索

Chan基于演化理论和组织学习视角强调。企业为提升其技术和组织知识、改善绩效鸿沟,需要持续在外部搜索新知识以进入新的业务或在内部搜索已有知识以扩展或缩减甚至最后退出现有业务。他指出组织搜索是与组织当前惯例评价相关的并导致其改变甚至急剧变革或者被替换的那些组织活动,并把搜索分为集中搜索和广泛搜索。其中集中搜索指沿着现有知识维度的试验,不需要获取额外的新知识,常使企业进入一个相关的业务领域并导致相关多元化;广泛搜索指沿着新知识维度的试验,企业往往进入不相关的领域并引起不相关多元化。Rosenkopf和Nerkar 强调创新搜索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影响因素,能促进组织惯例的变革,于是他们从企业构建“二阶能力”(second-order competence)视角出发,按跨技术边界和跨组织边界两个维度,把企业的创新搜索分为四个类型:本地搜索(local search)——建立在企业内相似技术基础之上的搜索;激进式搜索(radical search)——对企业边界之外异质技术的搜索;跨越内部技术边界的搜索(intemal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建立在企业内部异质技术基础之上的搜索；跨越组织边界的外部搜索 (external boundary spanning search)——对来自其他组织的在技术上邻近的知识的搜索。

类似地, Sidhu, Commandeur 和 Volberda 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出发, 指出创新搜索是为了发现新的技术、产品和业务方法, 寻求新的知识和试验新的可供选择的机会, 从远程到本地搜索信息或知识的行为。他们认为, 一个大量在非本地领域的创新搜索表明一个更高的探索导向, 反之表明一个更高的挖掘导向。其中, 远程搜索指在组织外部领域收集新知识和探索新机会, 本地搜索是指企业搜索的努力限制于现有知识和能力的相关领域。于是, 他们从供应维 (supply-side search, 包含所有关于技术方面的新知识的搜索)、需求维 (demand-side search, 在市场结构、产品使用与替换模式、顾客偏好与需求等市场新视角方面的探索努力) 和地理空间维 (geographic space-side search, 在不同地理区域对机会、本地化技术和运营经验的寻求) 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本地—远程搜索的连续性及其平衡问题。

(2) 强调远程搜索

Ahuja 和 Katila^[1] 利用演化理论讨论资源异质性的来源, 指出导致资源异质性的创造路径的搜索 (远程创新搜索) 是公司在本地搜索中对其所面临的两种特殊情况 (即技术耗尽和超越本国市场的扩张) 的一个回应。于是, 他们聚焦于远程创新搜索的两个维度, 即科学搜索和地理搜索, 剖析公司资源异质性的前因后果。其中科学搜索指在技术被充分挖掘的领域内正在进行发明的公司趋于搜索科学知识以获取富有生机的原始材料; 地理搜索指进入新的国际产品市场的公司趋于展开国际研究以瞄准本地的机会和问题。这种超越本地搜索的科学搜索和地理搜索提高了公司的资源位势, 导致了资源的异质性, 这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后续申请专利的可能。

而 Fabrizio 则基于科学知识在搜索过程中的作用和大学生产的科学知识对企业的重要性, 指出大学生产的新的科学知识是企业创新搜索的重要来源。他从新发明视角强调, 创新搜索是跨越可能新组合多维空间的一个不确定的过程, 以研究者有限理性和先前存在的认识为条件, 并把创新搜索分为搜索速度即企业挖掘现有知识用于授予专利权的新发明的速度和搜索质量即新发明的重要性两个维度。同样, Grime 和 Sofka 认为对外部有用新知识的搜索是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因为超企业边界的创新搜索能使其从发明和创意中收益最大化。他们从搜索的模式出发, 把创新搜索分为两个维度, 即市场 (顾客与竞争者) 知识的搜索和技术 (大学与供应者) 知识的搜索。

1.2 搜索的深度和范围 (或宽度)

在现有研究中, 只有少数文献聚焦于创新搜索的深度和范围 (或宽度) 两个维度。Katila 和 Ahuja 从新产品创新的视角出发, 指出创新搜索是组织解决问题的活动, 它涉及技术构念的创造和重新整合。同时他们强调, 企业的创新搜索或解决问题的努力不仅在搜索的范围, 企业的创新搜索实际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变化, 即搜索的深度 (企业经常重复利用现有知识的程度) 以及搜索的范围 (企业广泛探索新知识的程度)。

相似地, Laursen 和 Salter 从开放创新视角, 强调从外部环境搜索多样化的知识来源, 为企业创造技术和知识的新组合以及选择不同的技术路径提供了机会。于是, 他们基于企业在创新流程中怎样利用外部行动者的思想和知识这样一个问题, 根据企业外部搜索的来源, 把创新搜索分为搜索的宽度和深度, 其中搜索的宽度指外部来源的数量或企业在创新活动中依赖的搜索渠道, 搜索的深度指企业利用不同外部来源或搜索渠道的程度。

从总体上看, 学者们对创新搜索的内涵和分析维度均作了深入探讨, 但一般都是从知识距离领域的认知、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按照自己的研究目的作相应分析, 且分析时往往以组织的物理边界和知识距离作为搜索范围的界限, 较少研究跨越组织边界从组织间或合作联盟视角来同时讨论搜索的范围

和深度。其实,对企业而言,不论哪种分类测度,重要的是要管理好所划分的创新搜索各维度间的平衡,这才是其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因为,搜索不是无成本的,它需要时间、人力和其他资源的投入,是昂贵的。尽管从长远来看,远程搜索依赖于本地搜索、搜索的深度是搜索范围(或宽度)的基础,但是在某一时期内,企业资源既定的情况下,搜索新的创新源将减少对现有知识搜索的速度,反之亦然。

2 创新搜索的前因研究

目前专门探讨创新搜索影响因素的有关研究相对比较少,因此在分析比较多个相关领域的文献后,下面主要从组织内部和组织间两个方面来深入剖析影响创新搜索活动的前因。

2.1 组织内部视角

(1) 创新目标

组织创新搜索的方向和广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创新目标。例如,企业的创新活动一般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这些创新活动应有明确的目标,如产品创新目标可能包括开发一个全新产品或改善现有产品等,工艺创新目标可能包括诸如劳动力成本削减或改善生产柔性等。基于企业的创新目标和动机,其往往需要广泛而深入的搜索以汲取关键的知识来源,所以创新目标广度会影响创新搜索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而言,过于宽泛或过于单一的创新目标都会对创新搜索及组织绩效带来消极后果。因为,一方面,过于宽泛的创新目标和过于开放的热情会使搜索活动因跨越太多的搜索渠道而消耗太多的成本,造成过度搜索;另一方面,过于单一的创新目标会使企业容易错过很多创新机会,造成搜索狭窄。实际上,创新目标的管理往往根植于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管理者的期望,这些经验和预期可能导致企业创新目标过宽或过窄进而对创新搜索产生负面影响。

(2) 吸收能力(或企业内部研发)

在演化理论中,一个核心假设是本地搜索,它与企业先前的R&D活动紧密相关,企业通过本地搜索构建的专有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最近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一个适当的搜索策略关键取决于组织超越本地搜索、发现和识别外部知识来源潜在价值的吸收能力。这种内嵌于组织惯例和过程的吸收能力能通过组织的一系列惯例和过程,获取、消化、转换和应用外部的知识并为企业赢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它是企业先前知识库的函数,反映了企业内部积累的知识存量,主要体现在技术化的人力资源和自发的内在的学习努力如企业R&D投入。类似地,Fabrizio 在研究企业建立吸收能力活动与创新搜索之间联系的基础上提出,增强对汲取外部研究成果的吸收能力的投资,会导致较好的创新搜索并在搜索结果质量和速度方面提供有利条件。然而,虽然对吸收能力的投资是在一个开放的创新环境中实现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唯一。因为吸收能力强烈地和它先前的知识存量及过去的R&D活动有关,即存在路径依赖。于是,许多学者开始从组织间视角如社会网络、联盟合作等视角探讨其对创新搜索的重要性。

2.2 组织间视角

(1) 联结冗余性

联结冗余性强调企业在网络中的两种位置即突出位置与结构洞位置对企业的创新搜索行为和绩效带来的影响。处于突出位置的企业往往倾向于占据网络中心位置,因它与多个伙伴有直接联结,故能拥有存在于本地网络中的关键信息,这降低了企业创新搜索的成本,提高了搜索和转移流程的效率。而且它能使企业间更多地了解彼此的运营,促进用于解决问题的跨组织边界默会知识的转移,但是,这种位置在为组织创新搜索提供优质信息的同时,如果不能提供多样化和非冗余信息,那就有可能导

致相反的效果。尤其，当变革发生在一个要求汲取新的不同类型信息的产业中时，焦点企业可能会通过在现有网络伙伴内形成更多联结来增强他们现有的网络去应对这种变革，而不是与新的多样化的伙伴形成关系，这会进一步对他们创新搜索的努力和竞争位置产生消极影响。

相反，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其收益来自于信息的多样化和非冗余性，因为他们在具有不同信息内容的群体间架起了桥梁，即它为企业提供一种把多样化信息和现有知识重组后向市场提供特有产品的崭新整合的机会和领先者优势。这种领先者优势被这样一个“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比在网络中的其他企业更早地得到新颖信息”的事实推进。因为居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处于不同集团之间信息十字路口的战略性位置，企业控制了网络内信息的流动与扩散，并通过提供给那些集团形成联盟和网络的机会，以获取多样化知识来源，进而创造新的市场和产品。其实，这两种位置并不矛盾，对于不同群体、不同目标或不同情境以及不同类型的创新搜索行为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2）关系强度

创新搜索涉及复杂和默会知识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关系强度起着重要作用。关系强度的关键方面包括了行动者之间的二元交易关系，如信任、信赖、亲密的情感或相互的团结与协作等，强调直接联结作为交换优质信息的机制所起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强联结与优质信息和默会知识的获取与交换有关。Hansen认为较复杂或默会的知识更可能在强联结中被传递，而不是在弱联结中。虽然弱联结促进搜索，但强联结为实际转移和交流复杂问题和创新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通道。而且，更高的关系亲密性可能增加资源和默会复杂知识的转移，尤其是亲密的关系使合作伙伴更愿意花时间去仔细地解释、详述或聆听崭新的或复杂的创意和思想，享受这种内聚性二元关系的情感嗡嗡(emotional buzz)。此外，因为他们投资于和专注于某个方向，很少容忍信息噪音。当多重的和冗余来源被汲取时，信息噪音被减少，更多确切的信息被获取。因此，强联结有助于获取对一个特定创新(如改良和提高)的深层次理解。显然，较强的关系联结对企业深度创新搜索有着积极的作用。

而另外的研究则表明，弱联结比强联结更可能搜索到并获得远程的他人所拥有的特有的崭新信息。尽管强联结要求更高频率的交互作用和资源承诺，但弱联结提供了多样化的和非冗余的信息，有利于企业对多样化知识来源的广泛的创新搜索。而且相较于弱联结，强联结的时间和资源约束减少了企业能实际维持联结的数量，因此限制了企业延伸至不同的市场和技术领域。其实，强联结和弱联结对创新搜索的深度和广度有不同的优势，只是弱联结更有利于企业对多样化知识来源的广泛搜索。

（3）认知距离

在组织层面，企业在进行理性预算时会受到周围环境及原有思维意识或先前认识的限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以往获取的知识和经验。特别是在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环境中，依赖历史经验是企业的行为准则。换言之，过去搜索的结果成为开始新搜索的自然起点。企业搜索可能是本地的，那是因为组织在他们已有经验的领域有更大的可能性实现成功的技术开发。而且，重复使用相似的知识可降低错误和失败开始的可能性，促进惯例的发展，使搜索更加可靠。同时，由于在本产业中合法性和声誉的影响，突出的企业(prominent firm)往往寻求与其具有相似状况的企业做伙伴，并形成利益阵线，这种联结与合作行为促进了企业对现有技术和组织惯例的挖掘利用。可以说，搜索的深度能增加企业创新绩效原因在于它的专业化回报。显然，企业对原有知识的深度搜索很少可能与企业已存在的认知和原有的心智模式冲突。因此，组织间认知距离的邻近对创新搜索深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这也可能导致技术陈旧，约束公司沿着知识轨道的改进，出现刚性，从而使企业锁定于新的发展之外。因此，为避免这种自锁状态，企业需要从事所谓的具有破除现有主导设计、准则、规范、惯例和活动特征的远程搜索。对于焦点企业而言，认知距离的适度增加即焦点企业获得的新知识与其现有的技术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差异程度的提高，对现有知识的深度搜索和吸收能力的提高有消极的影响，但对于多样化知识来源的搜索和崭新价值(novelty value)创造的潜能有正面的影响。由此，组织间

认知距离的适度扩大对创新搜索的宽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企业的创新搜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可得技术机会的富裕程度、环境动荡程度和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搜索活动等。其实,在当今这个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技术快速变革的开放环境中,企业要获得持续的战略绩效和竞争优势,从内部R&D 支出中获得收益的优势已下降,企业网络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对创新搜索的重要影响日益显现。

3 创新搜索的相关实证研究

纵观目前组织创新领域内有关创新搜索前因后果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1)把创新搜索作为结果变量,考察网络嵌入性、吸收能力等因素对创新搜索的影响;(2)把创新搜索作为自变量,考察其对创新绩效、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影响;(3)把创新搜索作为中间解释机制,探索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内部作用机制。部分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如表2所示。

表 2 创新搜索的相关实证研究

研究分类	研究者(年份)	自变量	因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数据与方法
创新搜索 作为结果	Rowley et al. (2000)	关系嵌入 结构嵌入	远程搜索 本地搜索	/	产业环境	网络数据 多元回归
	Gilsing et al. (2008)	技术距离 网络位置 网络密度	新技术探索 (远程搜索)	/	/	网络数据 专利数据 泊松回归
	Fabrizio (2009)	合作联结 R&D	搜索质量 搜索速度	/	/	专利引用 数据 多元回归
创新搜索 作为前因	Rosenkopf & Nerkar (2001)	本地搜索 激进式搜索 跨越内部 技术边界搜索 跨越组织边 界外部搜索	后继技术 演进	/	/	专利引用数据 多元回归
	Katila & Ahuja (2002)	搜索范围 搜索深度	产品创新	/	/	专利数据 多元回归
	Laursen & Salter (2006)	搜索宽度 搜索深度	创新绩效	/	/	问卷调查 多元回归
创新搜索 作为中间 解释机制	Sidhu et al. (2007)	供应维搜索 需求维搜索 地理维搜索	创新性	/	环境动态性	调查问卷 多元回归
	Ahuja & Katila (2004)	技术耗尽 国外市场 扩张	创新绩效	科学搜索 地理搜索	/	专利数据 GLS 回归
	Grimpe & Sofka (2009)	吸收能力	创新成功	搜索模式	/	调查问卷 多元回归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参考文献整理。

3.1 创新搜索作为结果的实证研究

(1) 考察企业网络特征对创新搜索的影响

Rowley, Behrens 和 Krackhardt 在研究半导体和钢铁产业的战略联盟时指出, 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是焦点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但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应视产业环境而定。其中, 产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根据环境的复杂性、可预测性和变化频率加以区分的。他们强调: 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 低密度的网络结构和弱联结有利于企业的远程搜索, 而强联结的数量则不利于远程搜索;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 与直接合作者的强联结、关系密度以及强联结的数量有利于企业的本地搜索。Gilsing 等人 则根据网络嵌入性的三个维度, 即合作者之间的技术距离、企业的网络位置(中心性)和网络密度分析了联盟网络的作用。于是, 他们基于制药、化工和汽车产业中的技术联盟网络, 以焦点企业的年龄、规模和研发强度等作为控制变量, 实证了网络嵌入性三个维度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新技术探索(远程搜索)的影响。结果显示: 技术距离和远程搜索成倒U形关系; 每个焦点企业的中心性与远程搜索成倒U形关系; 网络密度与远程搜索成倒U形关系; 技术距离和中心性的交互作用对远程搜索有显著的负的影响; 技术距离和网络密度的交互作用对远程搜索的影响不显著; 中心性与网络密度的交互作用对远程搜索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2) 考察内部研发和外部合作对创新搜索的影响

Fabrizio 从企业构建吸收能力的活动和创新搜索过程之间的联系出发, 认为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以及其与大学科学家的合作将导致优良的新发明搜索并在搜索结果质量和速度方面提供优势。他们基于药品和生物技术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企业的研发强度、规模等作为控制变量, 实证了企业研发活动以及与大学的合作研究对搜索质量和速度的正向影响, 指出内部研发和外部合作是两个互补性活动, 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搜索活动和吸收能力的构建。

3.2 创新搜索作为前因的实证研究

(1) 考察搜索范围对创新绩效或创新性的影响

Rosenkopf 和 Nerkar 分析了四种不同类型搜索活动产生的知识对后继技术演进(subsequent technological evolution)的影响。以光盘技术为例, 研究结果表明: 在光盘技术申请专利的活动中, 没有跨越组织边界的搜索对后继技术演进一致产生低的影响。此外, 在光盘技术领域, 跨越组织边界但未跨越技术边界的搜索对后继技术演进的影响最高。同时, 在超越光盘技术领域(其他领域), 跨越组织边界和技术边界的搜索对后继技术演进的影响最好。而 Sidhu, Commandeur 和 Volberda 利用来自于制造业的跨部门数据, 发展和证实了一个可操作的不同维度的创新搜索的测量方法。并指出, 企业在供应维、需求维和地理空间维的本地—远程搜索的价值视环境而定。他们把环境动态性(技术变革的速度和不确定性)作为创新搜索和创新结果关系的调制变量, 对创新搜索与创新性作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在更加动态的环境中, 跨边界(远程)的供应维搜索与创新存在正相关, 如此, 这种探索性搜索在更少动态的环境中显得不利于创新。在更少动态的环境中, 跨边界(远程)的需求维搜索与创新存在正向变动关系, 这表明在更加动态的环境中, 这种搜索会危害创新。然而, 跨边界(远程)的地理空间维搜索不论在更加动态或更少动态的环境中, 对创新的贡献无显著区别。这表明, 在一个快速变化动态环境中, 公司须用需求维的本地搜索来管理供应维与地理空间维的远程搜索。当环境稳定时公司要颠倒这种平衡, 应把供应维的本地搜索与需求维和地理空间维的远程搜索结合起来。

(2) 考察搜索深度和范围(或宽度)对创新绩效或创新性的影响

Katila 和 Ahuja 以全球机器人产业(复杂的高技术产业)作为研究样本, 把产品创新(以设计方面变化为特征的新产品数量)为因变量, 创新搜索的深度和范围两个维度(用企业申请专业的活动测量)及其交互作用为自变量, 用合作频率、企业绩效、每年研发支出、产品多样化、企业规模、经济环境等作为控制变量, 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搜索的深度与新产品创新成倒U型关系; 搜索的范围与

新产品创新成正向变动的线性关系；搜索的深度是搜索范围的前提。类似地，Laursen和Salter 从开放创新的视角指出，广泛而深度的搜索和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虽然搜索的努力最初增加了绩效，但企业可能由于过度搜索其环境，妨碍了其创新绩效的提高。但他们同时强调，搜索的宽度是搜索深度的基础。

3.3 创新搜索作为中间解释机制的实证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从组织层面同时考察创新搜索的前因后果。Ahuja和Katilall 指出资源异质性是企业绩效差异的来源，而异质资源的产生是内生演化的。于是，他们识别了产生资源异质性的创造路径搜索（远程创新搜索）的决定因素即企业在其本地搜索中面临的两个特定情况或机会——技术耗尽和超越本国市场的扩张，并探讨了由此产生的资源异质性的绩效。在此基础上，他们把技术耗尽和国外市场扩张作为自变量，企业绩效作为因变量，创造路径的搜索的两个维度即科学搜索和地理搜索作为中介变量，对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化工企业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面临的两个特定情况触发了公司去创造独特的创新搜索路径，而这些创造的路径促进了组织间可持续的绩效差异。Grimpe和Sofka 则指出企业的搜索行为模式中介了创新的投入与产出，且低技术和高技术部门创新搜索的模式不同。他们以欧洲13个国家4500个企业为研究样本，把吸收能力（研发支出和员工技能）作为自变量，创新成功（新产品营业额）作为因变量，搜索模式作为中介变量，利用调查问卷收集相关数据，并进行了Tobit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低技术产业中的企业要取得创新成功应把搜索模式聚焦于顾客和竞争者的市场知识，在高技术产业的企业要获得高收益应把搜索模式聚焦于供应商和大学的技术知识。因此，对于低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应做好两种搜索模式的平衡和相应的创新投资，因为不同的外部知识要求企业专有的吸收能力用其现有的知识存量进行转换和整合。

综上所述，大多数研究把创新搜索看作是创新过程而不是创新结果，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倾向于把创新搜索置于既定状态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结果，而非从动态过程考虑。而且主流文献在解释创新搜索前因后果时，从权变视角或动态演化视角探讨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对缺少。此外，现有文献中部分研究把创新搜索作为结果变量考察了企业网络特征对创新搜索的影响，另一部分研究则主要从组织层面考察创新搜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由于创新搜索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同时从组织间和组织内层面考虑把创新搜索作为一个过程变量，如把其作为企业网络和吸收能力的中介变量，研究组织间和组织内因素通过影响创新搜索活动进而影响创新结果。

5 结论与展望

回顾梳理有关组织创新搜索的主流文献，发现不同理论学派对其解释均有其侧重。战略管理学派认为，企业试图通过创新搜索从组织外部获取关键资源以改善其竞争位置并使利润最大化，从而阻止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并增强其寡头垄断利润的潜能，实现持续的战略绩效。组织学习理论则认为，搜索是组织学习的一部分，通过搜索企业试图在一个模棱两可（ambiguous）的世界里解决问题。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和技术复杂程度的提高，组织只有进行不断学习和创新活动才能实现绩效改进。同时该理论指出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往往依赖于已建立的组织惯例以驾驭知识的搜索，但为避免出现“刚性”和冗余搜索，组织需要不断修改或变革其惯例。而演化理论强调了创新搜索在帮助企业寻找多样化知识来源中的作用，但其同时指出在创新搜索流程中路径依赖的重要性。换言之，组织创新搜索的努力与其消化吸收和整合新知识的吸收能力有关，而吸收能力与其现有的知识基础和过去的R&D 活动强烈相关。社会网络学派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企业所嵌入的社会网络提供了企业搜索关键资源或新知识的经济机会并降低了创新搜索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企业之间的关系和企业所处的网络位置对创新搜索行为和组织绩效有着重要影响。

从总体上看，组织创新搜索理论是当前开放创新环境下一个正在发展的新兴理论，关于组织创新

搜索的内涵与分析维度、影响因素和对其前因后果实证研究也正处于发展阶段,因此现有文献对于创新搜索作用和效果的解释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等仍然有待深化。

首先,学者们对创新搜索的测量更多的是以组织的物理边界为前提从知识距离领域的三个独立维度分别或同时考察组织创新搜索范围即本地—远程或跨界搜索(部分用探索—挖掘来替代)这样的单一维度的前因后果。但超越组织边界从组织间视角考察创新搜索深度和范围或广度等多个维度的研究还较少,而研究不同维度的交互作用对组织绩效影响的文献则更少。其实,搜索是有成本的,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从组织内和组织间视角考察创新搜索不同维度对组织绩效的重要性,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可帮助企业科学管理创新搜索,以免搜索过度或搜索不足。

其次,从权变视角看,引入多个调节变量考察创新搜索前因后果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还较少。由于在不同环境特征和组织情境条件下,这种作用机制是有差异的,所以仅简单考察创新搜索前因后果的直接关系,得出的结论势必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因此,有必要从权变视角引入调节变量,以弄清创新搜索前因后果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以其调节变量对这种机制作用的强度或方向。显然,调节变量的引入能使创新搜索前因后果作用机制的研究更加准确地还原于经济现实,也更具有解释力和现实意义。

再者,在研究方法上,众多研究依赖于专利统计和后续的专利引用作为创新和创新搜索的指标,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因为不是所有的发明均可专利化,它们被广泛认为仅是创新流程的部分指标,并且不是所有的发明都可授予专利权。况且,获准专利的发生率在各部门呈现不同变化,这使得跨产业的比较陷入困境。此外,授予专利权的企业的分布存在严重的偏斜。因此,在未来的研究当中我们需要利用互补的方法来测量创新搜索,如调查和案例研究。

最后,在研究对象选择上,许多学者均聚焦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企业(或产业)如生物学、电子学、半导体等,但至今在这个领域很少有学术研究关注于低或中等技术位势的企业(或产业),更不用说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了。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展开相关探索,以补充和拓展相关理论以指导实践。

作者:洪茹燕(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8卷第6期

提高缴费率还是推迟退休?



统计学

1 引言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中国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通常,国际上把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7%的标准,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在2000年这一比重就已达到7%,而2010年这一比重达到了8.9%。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增长速度非常快且老年人口数量巨大。根据联合国秘书处

经济社会部人口处关于中国人口预测数据显示,到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2.0%,2070年将出现最高值30.2%,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将出现最高值,达到36.0%。

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已面临支付压力的养老金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根据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和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这两个文件规定,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一部分来自于工作期间个人账户积累,一部分来自于企业缴纳的社会统筹养老金。实际上社会统筹部分就是工作人口向退休人口的代际转移。在此制度安排下,如果缴费率不变,随着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和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工作人口将会减少,养老保险缴费也会减少,那么每个工作人口负担的老年人口将会增多。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还面临着严重的“隐性债务”(王燕等,2001;袁志刚,2001;任若恩等,2004;贾康,2007;彭浩然等,2009)和养老金个人账户“空帐”问题(孙祁祥,2001;谢安,2005;何立新,2007;彭浩然等,2008;彭浩然、陈斌开,2012)。而老龄化的加剧又使得养老金支付压力变得更加严峻。因此,从养老金支出方面看,在养老金支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老年人口增多意味着养老金支出将会更多。

从养老金收支两方面考察,可以预计人口老龄化将使本已面临严重压力的养老金收支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我们应如何应对才能缓解这一状况,以保障事关民生的养老问题,这正是本文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后面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简要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的建立与分析;第四部分是理论模型比较静态分析;第五、六部分将进行参数设定和数值模拟分析;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2 文献回顾

养老保险收支压力是世界性的问题。因此,国内外研究养老保险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的文献十分丰富。关于如何解决养老金收支压力问题文献中讨论较多的是以下三种途径。

一是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即从现收现付制转为部分基金制或完全基金制。为了解决养老金融资问题,目前许多国家正在考虑进行或已完成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基金制的改革(Feldstein, 2005[31; Adema et al., 2009)。Feldstein and Samwick(1997, 1998)针对美国的情况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已无力承担养老金支付压力。在此制度下养老金回报率低且对储蓄有负面影响,因此应转向完全基金制。Belan and Pestieau(1999)认为从现收现付制转为完全基金制除了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外,还具有一些现收现付制也具有的特点。许多国内外学者也对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转轨问题进行了考察,但是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效应是积极的,因而持比较积极的态度(Feldstein, 1999; 郑伟、孙祁祥, 2003; 李时宇, 2010)。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条件还不成熟,依据不充分(袁志刚, 2001; 何樟勇、袁志刚, 2004; 程永宏, 2005; 彭浩然等, 2008; 邵宜航等, 2010; 柳清瑞、金刚, 2011)。

二是推迟退休年龄。近年来国内外对退休年龄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多数学者主要是研究养老保险对退休年龄的影响,特别是养老金是否导致了提前退休。部分学者从理论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Feldstein, 1974; Hu, 1979; Burbidge and Robb, 1980; Crawford and Lilien, 1981; Sheshinski, 1978; Miehle and Pestieau, 1999; Cremer et al., 2004)。也有部分学者从实证方面进行了检验

(BSrseh-Supan and Schnabel, 1998; Bfrsch-Supan, 2000; Samwick, 1998; Gruber and Wise, 1998; Gruber et al., 2009)。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多数学者都得出了社会保障或养老金导致提前退休的结论。也有学者从出生率、死亡率及预期寿命等人口统计角度考察其对退休年龄的影响(d' Autume, 2003; Hansen and Lonstrup, 2009; Kalemli. Ozcan and Weil, 2010)。

关于退休年龄对社会保障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是否要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问题,目前国外学者研究的较少,不过也有学者进行了分析(Cremer and Pestieau, 2003)。相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丰富。国内学者从预期寿命延长、教育水平的提高、低龄退休、养老金制度自身缺陷、企业负担过重等不同视角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进行了考察。无论从哪方面进行考察,他们认为推迟退休主要目的只有一个:缓解养老金收支失衡压力。因为在养老保险缴费率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推迟退休年龄对缓解养老金收支失衡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推迟退休使得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增加,从而养老保险缴费总量增加;另一方面推迟退休又使得退休人口减少,从而减少了养老金支出水平。因此,推迟退休可以从增收减支两方面来改善养老金收支失衡问题。正是基于解决养老金收支失衡这一目的,推迟退休年龄的建议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

三是调整养老保险缴费率和替代率。虽然提高养老金缴费率和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可以直接增加养老金水平,但是与前两种解决养老金收支压力的途径相比,关于调整养老金缴费率及替代率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其原因可能在于税收竞争给缴费者带来的巨大税收压力及福利刚性使得养老金水平难以降低。因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最优缴费率、最优替代率的设定(Samuelson, 1975; 杨再贵, 2008, 2010, 2011)。不过也有少数学者考察了养老金缴费率和替代率的变动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林忠晶、龚六堂, 2007; 杨再贵, 2008, 2010)。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首先,目前大量国外文献在研究养老金问题时多数在世代交叠(Overlapping Generation, OLG)模型的框架内进行分析,而国内利用OLG模型研究养老金问题的文献较少,而利用此模型研究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缴费的文献更少;其次,对于退休和养老保险缴费的分析基本都是独立进行的,没有进行较为全面的对比分析,即在提高缴费率和推迟退休之间哪个政策较可取并没有进行全面比较。鉴于文献中上述不足,本文将在一般均衡的OLG模型框架内较为全面地对比分析提高缴费率和推迟退休对经济系统各变量的影响,从而说明提高缴费率和推迟退休哪种政策更为合理。

3 模型设定

以Diamond(1965)OLG模型为基础,我们借鉴Michel and Pestieau(1999)和d' Autume(2003)模型的设定形式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模型设定。具体模型设定如下文所述。

3.1 个人决策

在一个无限存续的经济中有众多的个人和企业,一个政府。有限生命的个人只生存两期,t期和t+1期,每期长度假设都固定为1。每一期都存在两代人: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其数量分别为 N_t^y 和 TN_t^{t-1} ,其中 $N_t^y = (1+b)N_{t-1}^y$,b为每代人口不变的人口增长率。同代人之间都是同质的,且代表性个人在第二期只生存到时间 $(Z < T \leq 1)$ 。在t期出生的个人在t期参加工作,无弹性供给一单位劳动,获得工资收入 W_t 。在t+1期,t期出生的个人仍必须工作一段给定的时间 $z(0 \leq z \leq T)$,获得工资收入 zW_{t+1} ,然后退休享受休闲。另外,我们假定从工作期生存到退休期的概率为1。代表性个人通过两期的消费和退休后休闲最大化自己一生的效用。这样t期出生的代表性个人一生效用可用如下对数效用函数表示为:

$$U_t = \log(c_t^i) + \beta T[\log(c_{t+1}^i/T) + \eta \log((T-Z)/T)], 0 < \beta < 1, \eta > 0 \quad (1)$$

其中, U_t 为个人一生效用, c_t^i 和 c_{t+1}^i 分别为个人在第 t 期和第 $t+1$ 期内的消费水平; β 为主观效用贴现率; $T-Z$ 为退休后休闲时间, 而 η 为个人对休闲的偏好。

在现行混合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 t 期出生的代表性个人在 t 期内要缴纳 $(\tau + \theta)W_t$ 单位的养老保险费分别用于充实自己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和用于代际转移的社会统筹账户, τ 和 θ 分别为固定的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①。在 t 期内个人工资收入除了用于消费和缴纳养老保险费外, 还有一部分用于私人储蓄 S_t^i 。由于在 t 期出生的个人 $t+1$ 期仍工作一段时间, 所以这里假设其在 $t+1$ 期不再进行储蓄, 但仍缴纳社会统筹养老费, 那么 $t+1$ 期他的收入就包括净工资收入 $(1-\theta)ZW_{t+1}$, t 期的储蓄收入 $R_{t+1}S_t^i$, 获得的社会统筹养老金收入 P_{t+1}^{t+1} 及个人账户积累的养老金收入 $F_t^i R_{t+1}$, R_{t+1} 为储蓄的回报率, 实际上个人账户积累的部分是一种储蓄, 其回报率也为 R_{t+1} , 只不过它是一种强制储蓄。在以上假设的条件下, 个人第 t 期和第 $t+1$ 期的预算约束条件分别为:

$$c_t^i = (1 - \tau - \theta)W_t - S_t^i \quad (2)$$

$$c_{t+1}^i = R_{t+1}S_t^i + P_{t+1}^{t+1} + (1 - \theta)ZW_{t+1} + F_t^i R_{t+1} \quad (3)$$

在式 (2) 和式 (3) 下, 个人最大化一生效用, 可得效用函数关于 S_t^i 的一阶条件为:

$$c_{t+1}^i / c_t^i = \beta T R_{t+1} \quad (4)$$

3.2 生产行为

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存在众多的同质生产性企业。这些企业利用资本和劳动生产同质的最终消费品, 并最大化其利润。我们假设企业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 Cobb—Douglas 形式, $F(K, L) = AK^{\alpha}L^{1-\alpha}$, $0 < \alpha < 1$ 。其中, $F(K, L)$ 为第 t 期内的总产出, K_t 为 t 期内积累的总资本存量, 假设每期后资本完全折旧。 N_t 为 t 期内总的劳动供给, 其包括两部分: 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劳动供给, 用公式可表示为 $L_t = N_t^y + ZN_t^{y-1} = N_t^y[1 + Z/(1+b)]$ 。 A 为外生给定的技术进步水平或全要素生产率。用人均形式表示生产函数为 $f(k_t) = Ak_t^{\alpha}$, 其中 $k_t = K_t / L_t$ 表示所有工作人口人均资本存量或劳均资本积累。在这里为了后面分析的方便, 我们再定义年轻人口的人均资本存量 $\tilde{k}_t = K_t / N_t^y = k_t[1 + Z/(1+b)]$ 。生产函数除了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外, 还满足稻田条件。完全竞争市场中, 均衡时资本和劳动分别获得其边际回报:

$$R_t = \alpha Ak_t^{\alpha-1} \quad (5)$$

$$W_t = (1 - \alpha) Ak_t^{\alpha} \quad (6)$$

3.3 政府行为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维持养老金的收支平衡。一是向年轻人口征收社会统筹养老保险费,用于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社会统筹养老金。二是为个人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以便把其缴纳的个人养老保险费充实其个人账户,等其退休后再把个人账户积累的养老金连本带息返还给个人。这样政府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养老金预算平衡公式分别为:

$$(T - Z)N_t^{t-1}P_t^t = \theta W_t N_t^t + \theta Z W_t N_t^{t-1} \quad (7)$$

$$F_t^t N_{t+1}^t = \tau W_t N_t^t \quad (8)$$

式(7)说明均衡时所有年轻人口每期缴纳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费总额应该等于向同期退休人V1支付的社会统筹养老金总额。式(8)说明每期所有年轻人口缴纳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费都用于充实政府为其建立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如果式(7)两边同除以 N_{t-1} 那么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可表示为 $P_t^t = [\theta(1 + b + Z)W_t]/(T - Z)$ 。这样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就表示为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

θ 、人口增长率 b 、退休年龄 Z 、工资 W_t 和预期寿命 T 的函数。式(8)两边同除以 N_t^t ,个人账户养老金可表示为 $F_t^t = \tau W_t$ 。这样个人账户养老金就是工资及个人缴纳的养老金缴费率 τ 的函数。

3.4 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出清条件

资本积累来源于两部分:一是私人储蓄,二是个人账户的养老金积累。由于我们假设个人在第二期虽然从事一段时间工作,但是不再进行储蓄且不再缴纳养老保险费。所以每一期的资本积累就来自于年轻人口的储蓄和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额。所以均衡时 t 时期年轻人口的总储蓄和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必须等于 $t+1$ 期总的资本存量,即 $K_{t+1} = N_t^t(S_t^t + \tau W_t)$,其人均形式为:

$$\bar{k}_{t+1} = (S_t^t + \tau W_t)/(1 + b) \quad (9)$$

企业每期生产的总消费品除了用于下期资本积累外还必须满足每一期内所有人口的消费,即:

$$F(K_t, L_t) = N_t^t c_t^t + T N_t^{t-1} c_t^{t-1} + K_{t+1} \quad (10)$$

3.5 定义竞争均衡

在上面经济模型假设条件下,经济的竞争均衡要求个人最大化自己一生效用,企业最大化利润,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出清。竞争均衡具体定义如下:

给定 k_1 和 A 及其他参数,竞争市场均衡要求个人资源配置 $\{c_t^t, c_{t+1}^t, S_t^t\}_{t=1}^{\infty}$,企业资源配置 $\{K_t, L_t\}_{t=1}^{\infty}$ 和价格水平 $\{R_t, W_t\}_{t=1}^{\infty}$,使得① c_t^t, c_{t+1}^t, S_t^t 在预算约束式(2)-(3)下最大化个人效用式(1);② K_t, L_t 最大化企业利润;③市场出清条件式(5)-(6)和式(9)-(10)满足;④政府预算平衡式(7)-(8)成立;⑤初始资本 $k_1 > 0$ 。

如果以上所有条件满足,则整个经济就是竞争均衡的。将式(2)-(3)和式(5)-(9)代入式(4)整理可得由差分方程描述的动态均衡条件:

$$\left\{ \frac{(1+\beta T)(1+b+Z)}{(1-\alpha)(1-\theta)\beta T} + \frac{Z}{\alpha\beta T} + \frac{(1+b+Z)\theta}{(T-Z)(1-\theta)\alpha\beta T} \right\} k_{t+1} = A k_t^\alpha \quad (11)$$

容易证明只要在稳态 k 处 $0 < dk_{t+1}/dk_t < 1$, 动态均衡条式(11)就存在唯一、稳定且非振荡的稳态均衡。即从任一初始资本存量 k , 开始, k 都会收敛到稳态点 k^* 。不过, 鉴于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此我们只分析稳态均衡。稳态时的劳均资本存量为:

$$k^* = \left\{ \frac{(1+\beta T)(1+b+Z)}{(1-\alpha)(1-\theta)\beta T A} + \frac{Z}{\alpha\beta T A} + \frac{(1+b+Z)\theta}{(T-Z)(1-\theta)\alpha\beta T A} \right\}^{\frac{1}{\alpha-1}} \quad (12)$$

因为式(12)等号右边为常数, 所以为表达方便, 我们令

$$B = \frac{(1+\beta T)(1+b+Z)}{(1-\alpha)(1-\theta)\beta T A} + \frac{Z}{\alpha\beta T A} + \frac{(1+b+Z)\theta}{(T-Z)(1-\theta)\alpha\beta T A} > 0, \quad \text{式(12)可以变为} \\ k^* = B^{1/(\alpha-1)}。$$

求出稳态劳均资本存量后很容易得到稳态的 $W^*, R^*, P^*, F^*, S^*, c_1^*, c_2^*, U^*$, 分别为:

$$W^* = (1-\alpha)A(k^*)^\alpha \quad (13)$$

$$R^* = \alpha A(k^*)^{\alpha-1} \quad (14)$$

$$P^* = \frac{(1+b+Z)\theta W^*}{T-Z} \quad (15)$$

$$F^* = \tau W^* \quad (16)$$

$$S^* = (1+b+Z)k^* - \tau W^* \quad (17)$$

$$c_1^* = (1-\tau-\theta)W^* - S^* \quad (18)$$

$$c_2^* = R^*S^* + P^* + (1-\theta)ZW^* + F^*R^* \quad (19)$$

$$U^* = \ln(c_1^*) + \beta T \left[\ln\left(\frac{c_2^*}{T}\right) + \eta \log\left(\frac{T-Z}{T}\right) \right] \quad (20)$$

4 养老保险费、退休年龄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

4.1 养老金缴费率、退休年龄对劳均资本存量的影响

从式(12)容易看出, 方程右边并没有出现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率 r , 因此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率的变化不会影响资本积累和产出。养老金缴费率和退休年龄对劳均资本存量的影响分别为:

$$k_{\tau}^* = 0 \quad (21)$$

$$k_{\theta}^* = \frac{1}{\alpha - 1} B^{\frac{2-\alpha}{\alpha-1}} D < 0 \quad (22)$$

$$k_z^* = \frac{1}{\alpha - 1} B^{\frac{2-\alpha}{\alpha-1}} E < 0 \quad (23)$$

其中,

$$D = \frac{(1 + \beta T)(1 + b + Z)}{(1 - \alpha)(1 - \theta)^2 \beta T A} + \frac{1 + b + Z}{(T - Z)(1 - \theta)^2 \alpha \beta T A} > 0$$

$$E = \frac{(1 + \beta T)}{(1 - \alpha)(1 - \theta) \beta T A} + \frac{1}{\alpha \beta T A} + \frac{(1 + b + T)\theta}{(T - Z)^2(1 - \theta) \alpha \beta T A} > 0$$

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 社会统筹缴费率 θ 提高会降低 k^* 。这主要因为, 一方面 θ 降低了个人工资收入, 从而降低了私人储蓄量; 另一方面工资下降也降低了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两方面共同导致了 K^* 的降低。推迟退休年龄 Z 同样降低了 K^* 。直观上看这是因为 z 提高直接增加了劳动供给, 从而使得 K^* 降低。总的来看, 提高社会统筹缴费率和推迟退休都降低了劳均资本存量。

4.2 养老金缴费率、退休年龄对价格的影响

根据式(5)和式(6)我们可以求出, R^* 和 W^* 分别关于个人账户缴费率 τ 、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 θ 及退休年龄 Z 一阶偏导数:

$$R_{\tau}^* = 0 \quad (24)$$

$$R_{\theta}^* = \alpha(\alpha - 1)A(k^*)^{\alpha-2}k_{\theta}^* > 0 \quad (25)$$

$$R_z^* = \alpha(\alpha - 1)A(k^*)^{\alpha-2}k_z^* > 0 \quad (26)$$

$$W_{\tau}^* = 0 \quad (27)$$

$$W_{\theta}^* = \alpha(1 - \alpha)A(k^*)^{\alpha-1}k_{\theta}^* < 0 \quad (28)$$

$$W_z^* = \alpha(1 - \alpha)A(k^*)^{\alpha-1}k_z^* < 0 \quad (29)$$

从求导结果可知, τ 的变化对 R^* 和 W^* 没有影响。 θ 和 Z 的提高都会导致 R^* 的提高, 主要是因为 θ 和 Z 的提高降低了 k^* 。 θ 和 Z 的提高都会导致 W^* 的降低, 同样是因为 k^* 的降低。

4.3 养老金缴费率、退休年龄对养老金账户的影响

根据式(15)和式(16), 可推导 τ , θ 及 Z 对 P^* 和 F^* 的影响。推导结果如下:

$$F_{\tau}^* = W^* > 0 \quad (30)$$

$$F_{\theta}^* = \tau W_{\theta}^* < 0 \quad (31)$$

$$F_z^* = \tau W_z^* < 0 \quad (32)$$

$$P_{\tau}^* = 0 \quad (33)$$

$$P_{\theta}^* = \frac{1 + b + Z}{T - Z}(\theta W_{\theta}^* + W^*) \quad (34)$$

$$P_z^* = \frac{(T - Z)(1 + b + Z)\theta W_z^* + (1 + b + T)\theta W^*}{(T - Z)^2} \quad (35)$$

从推导结果式(30)–(32)可知,提高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率 τ 直接提高了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原因在于 τ 的变化不会影响工资收入。而提高社会统筹养老金缴率 θ 和推迟 z 都会导致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的下降。因为提高 θ 和推迟 z 都会使得单位工资收入下降,因而个人账户养老金缴费也会下降。对于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来说,情况有些复杂。推导结果式(33)–(35)显示,提高对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没有影响。这同样是因为 τ 的变化不会影响工资收入。但是 θ 和 z 对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θ 提高一方面直接增加了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单位工资收入,促使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下降。 z 对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的影响基本类似。推迟退休一方面使得工作人口增多,缴费增多,另一方面又使得单位工资下降。因此 θ 和 z 对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的影响难以直接判断。

4.4 养老金缴费率、退休年龄对私人储蓄、消费和效用的影响

根据上面得出的储蓄表达式式(17)–(20)我们可以推导出养老金缴费率、退休年龄变化对私人储蓄、消费及效用的影响,结果如下:

$$S_{\tau}^* = -W^* < 0 \quad (36)$$

$$S_{\theta}^* = (1+b+Z)k_{\theta}^* - \tau W_{\theta}^* \quad (37)$$

$$S_z^* = (1+b+Z)k_z^* + k^* - \tau W_z^* \quad (38)$$

$$c_{1\tau}^* = 0 \quad (39)$$

$$c_{1\theta}^* = (1-\tau-\theta)W_{\theta}^* - S_{\theta}^* \quad (40)$$

$$c_{1z}^* = (1-\tau-\theta)W_z^* - S_z^* \quad (41)$$

$$c_{2\tau}^* = 0 \quad (42)$$

$$c_{2\theta}^* = R^*S_{\theta}^* + R_{\theta}^*S^* + P_{\theta}^* + (1-\theta)ZW_{\theta}^* - ZW^* + F^*R_{\theta}^* + F_{\theta}^*R^* \quad (43)$$

$$c_{2z}^* = R^*S_z^* + R_z^*S^* + P_z^* + (1-\theta)ZW_z^* + (1-\theta)W^* + F^*R_z^* + F_z^*R^* \quad (44)$$

$$U_{\tau}^* = 0 \quad (45)$$

$$U_{\theta}^* = \frac{c_{1\theta}^*}{c_1^*} + \frac{\beta T c_{2\theta}^*}{c_2^*} \quad (46)$$

$$U_z^* = \frac{c_{1z}^*}{c_1^*} + \frac{\beta T c_{2z}^*}{c_2^*} - \frac{\beta T \eta}{T-Z} \quad (47)$$

从推导结果式(36)–(38)可知,提高 τ 降低了私人储蓄量,因为提高 τ 增加了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在 τ 对资本存量没有影响的情况下个人账户积累和私人储蓄是一一替代的关系,这一点从式(21)、式(30)及式(36)可以看出。提高 θ 和 z 对私人储蓄的影响不确定。因为 θ 提高一方面降低了单位工资收入,从而降低了个人账户本金积累水平,使得私人储蓄增加;另一方面,单位工资降低也直接导致私人储蓄降低。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 θ 提高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变得不确定。推迟 z 对私人储蓄的影响也因同样的原因变得不确定。

从上面的推导结果式(39)和式(42)可以看出, τ 变动对 c_1^* 、 c_2^* 都不产生影响,原因在于私人储蓄和个人账户本金积累的相互抵消作用。提高 θ 和推迟 z 对 c_1^* 的影响难以直接判断。这源于 θ 和 z 提高带

来的两种效应。从式 (40) 可知, θ 提高一方面会造成单位工资下降, 从而 $\dot{c}_1$ 下降, 另一方面 θ 提高对私人储蓄的影响不明确。这两种作用使得 θ 提高对 $\dot{c}_1$ 的影响不易确定。从式 (41) 可以看到, Z 的提高降低了单位工资收入, 但是对私人储蓄的影响也难以确定。因此 z 提高对 $\dot{c}_1$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难以直接确定。

再看 θ 和 Z 提高对 $\dot{c}_2$ 的影响。从式 (43) 和式 (44) 可看出 θ 和 Z 提高对 $\dot{c}_2$ 的影响更为复杂, 原因在于 θ 和 Z 提高不仅通过影响价格和私人储蓄来影响 $\dot{c}_2$, 还会通过影响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来影响 $\dot{c}_2$ 。我们前面分析指出 θ 和 Z 提高都能降低单位工资收入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本金, 但是其对私人储蓄和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 θ 和 Z 提高对 $\dot{c}_2$ 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既然 θ 和 Z 对 $\dot{c}_1, \dot{c}_2$ 的影响不易直接判断, 而且 z 还能直接影响效用, 那么 θ 和 z 提高对效用的影响也难以进行直接判断。不过, 对效用的影响容易得出, 因为 τ 对 $\dot{c}_1, \dot{c}_2$ 都没影响, 所以对效用也没有影响。

通过养老金缴费率、退休年龄对经济中多个变量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 总体上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第一, 提高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率 τ 除了能增加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和降低私人储蓄外对劳均资本积累、价格水平、消费、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和效用均没有影响。第二、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 θ 和退休年龄 Z 的提高都会降低劳均资本存量、工资水平和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 但是都会增加资本回报率。第三, 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 θ 和退休年龄 Z 的提高对消费、储蓄、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及效用的影响不明确, 因而也就难以比较提高养老金缴费率和推迟退休年龄这两种政策哪一个比较合适。鉴于此, 我们将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以比较两种政策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5 模型参数校准

5.1 物质资本回报率 α 和技术进步率 A 的确定

Chow and Li (2002) 利用中国大陆 1952—1998 年的数据得到的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为 0.65。张军 (2002) 估算的中国物质资本贡献率为 0.499。林忠晶、龚六堂 (2007) 指出实证研究中以中国经济为范例时, 若生产函数为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那么一般假设物质资本贡献率在 0.3~0.8 之间, 而他们在文章中采用的物质资本贡献率设定为 0.65。邵宜航等 (2010) 和刘勇政、冯海波 (2011) 在综合考虑了文献中关于物质资本贡献率设定后, 将其设定为 0.5。另外, 根据蔡畴 (2010, 2011) 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物质回报率应会有所下降。因此参考文献结论及我们的判断, 本文取 0.45 为物质资本回报率, 即 $\alpha=0.45$ 。

关于技术进步率文献中也存在一定差异。张军和施少华 (2003) 估算的 1978—1998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 2.8%。郭庆旺、贾俊雪 (2005) 估算的 1979—2004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 0.89%。李宾、曾志雄 (2009) 估算的 1979—2007 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 3.59%。综合文献中估算的结果, 我们取 2.5% 作为本文年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因为本文模型中时期长度为 30 年, 所以 A 的取值为 2.05。

5.2 主观效用贴现率 β 和休闲偏好 η 的确定

主观效用贴现率的取值文献中差异不大。Pecchenino and Pollard(2002), 杨再贵(2008, 2010), 刘勇政、冯海波(2011)等设定每年主观效用贴现率为0.98。邵宜航等(2010)设定每年主观效用贴现率为0.99。我们选择0.98作为每年的主观效用贴现率。在我们的两期OLG模型中, 我们假设每期长度为30年, 因此 $\beta=0.5566$ 。关于个人对休闲的偏好 η 确定存在较大差异。Hansen and Lcnstrup(2009)取了0.5和1.5两个值分别进行模拟检验, 而Hansen and Lonstrup(2012)又设定为0.8。综合文献取值情况及中国现实情况, 我们设定 η 为1.50)。

5.3 人口增长率 b 的确定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关于中国人口预测数据显示, 2011-2025年人口呈现较低的正增长, 而2026-2040年将会出现负增长情况。因此我们取2011-2040年的均值作为本文的年度人口增长率。经计算, 年度人口增长率为0.0483%。由于我们考察的期限为30年, 所以模型中的每期人口增长率为0.0141, 即 $b=0.0141$ 。

5.4 缴费率 τ 和 θ 确定

根据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和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这两个文件对养老保险缴费的规定, 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 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 个人账户从2006年1月1日起已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 调整为8%, 而且全部由个人缴费构成, 企业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为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其缴费比例为20%, 其中8% 记入个人账户。由于研究的是全国水平, 我们假设所有消费者均参加养老保险, 并且有统一的缴费率。那么这个全国统一的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率应较小。参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比例, 我们选取10%作为社会统筹缴费率, 即 $\theta=0.1$, 而个人账户缴费率仍为8%, 即 $\tau = 0.08$ 。

5.5 其他参数的确定

我们先确定实际参加工作的年龄。我们的模型中假设人口出生便参加工作, 但是结合现实进行数值模拟时还要考虑实际参加工作的年龄。我们选取20岁作为开始参加工作的年龄。在模型每期长度为30年的假设下, 在第一期末人口实际年龄为50岁。我们假设法定退休年龄为55岁, 这样个人在其生命的第二期只需要再工作5年便可退休。因此, 我们可以计算出 z 的值为 $1/6$ 。另外,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关于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预测数据计算, 2011—2040年之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平均为75.9岁, 因此 T 的值为 $25.9/30=0.8633$ 。所有参数值总结在表1中。值得强调的是, 以上参数取值都为基准值, 在模拟时我们会变动税率和退休年龄以分析其对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

表 1 参数取值

α	β	b	τ	θ	Z	T	η	A
0.45	0.5566	0.0141	0.08	0.1	1/3	0.8633	1.5	2.05

6 数值模拟分析

本节主要基于上面的证明对养老金缴费率和退休年龄对稳态的劳均资本存量、价格水平、养老金水平、私人储蓄、消费及效用的影响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由于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率只对养老金个人账户和私人储蓄产生影响, 而对我们考察的其他经济变量没有影响, 因此我们只模拟社会统筹缴费率

和退休年龄对以上各经济变量的影响。

首先,我们模拟分析当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和其他参数不变时推迟退休年龄对各经济变量的影响。因为许多学者建议将中国的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所以我们计算退休年龄从55岁逐步推迟到65岁时经济系统各变量会如何变化。模拟结果见表2。

表 2 推迟退休对经济中各变量的影响

年龄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k^*	0.0678	0.0623	0.0573	0.0529	0.0489	0.0452	0.0419	0.0388	0.0360	0.0333	0.0308
W^*	0.3355	0.3227	0.3109	0.2998	0.2893	0.2794	0.2699	0.2608	0.2520	0.2435	0.2350
R^*	4.05	4.24	4.44	4.64	4.84	5.06	5.27	5.50	5.73	5.98	6.25
F^*	0.0268	0.0258	0.0249	0.0240	0.0231	0.0224	0.0216	0.0209	0.0202	0.0195	0.0188
F^*R^*	0.1084	0.1094	0.1105	0.1113	0.1119	0.1132	0.1139	0.1149	0.1158	0.1167	0.1174
P^*	0.0568	0.0591	0.0616	0.0644	0.0675	0.0710	0.0750	0.0796	0.0848	0.0909	0.0980
S^*	0.0532	0.0498	0.0466	0.0437	0.0411	0.0386	0.0362	0.0340	0.0319	0.0298	0.0278
c_1^*	0.2217	0.2148	0.2083	0.2021	0.1962	0.1905	0.1851	0.1799	0.1748	0.1698	0.1649
c_2^*	0.4310	0.4377	0.4441	0.4505	0.4567	0.4629	0.4691	0.4753	0.4816	0.4881	0.4949
U^*	-2.14	-2.21	-2.27	-2.34	-2.41	-2.49	-2.56	-2.64	-2.73	-2.82	-2.92

从表2可以看出,在我们模拟的退休年龄变动区间推迟退休减少了稳态的劳均资本存量、单位工资水平和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私人储蓄、第一期消费及效用水平。但是,推迟退休增加了资本回报率、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和第二期的消费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资本回报率的增加,个人账户养老金收入 F^*R^* 是不断增加的。结合理论部分的分析可知,推迟退休导致的劳均资本存量、单位工资、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的下降和资本回报率上升与理论部分一致。推迟退休导致的工作人口增加从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缴费增加对社会统筹养老金产生的正影响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使得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增加。对于私人储蓄下降来说,推迟退休导致的单位工资水平下降直接降低私人储蓄起了主导作用。第一期消费水平降低源于两种作用的结果: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一方面推迟退休导致单位工资水平下降减少了消费;另一方面,推迟退休导致私人储蓄下降,又增加了第一期消费水平。最终单位工资下降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从而使得第一期消费水平降低。第二期消费增加的原因更加复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由推迟退休导致的单位工资水平、私人储蓄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本金降低减少了第二期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推迟退休又导致了资本回报率和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增加,这又增加了第二期消费水平。另外,推迟退休还直接通过增加总收入而增加了第二期消费水平。最终增加消费的因素占了主导作用,导致第二期消费水平增加。

其次,我们模拟分析当退休年龄为55岁且其他参数不变时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提高对经济变量的影响。我们取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的变动区间为0.1~0.3。模拟结果见表3。

表 3 提高社会统筹养老金税率对经济中各变量的影响

税率	0.10	0.12	0.14	0.16	0.18	0.20	0.22	0.24	0.26	0.28	0.30
k^*	0.0678	0.0631	0.0586	0.0545	0.0506	0.0470	0.0436	0.0404	0.0374	0.0347	0.0320
W^*	0.3355	0.3245	0.3141	0.3039	0.2940	0.2843	0.2749	0.2657	0.2567	0.2479	0.2393
R^*	4.05	4.21	4.38	4.56	4.75	4.95	5.16	5.38	5.61	5.85	6.11
F^*	0.0268	0.0260	0.0251	0.0243	0.0235	0.0227	0.0220	0.0213	0.0205	0.0198	0.0191
R^*F^*	0.1084	0.1096	0.1100	0.1109	0.1117	0.1124	0.1135	0.1145	0.1150	0.1159	0.1167
P^*	0.0568	0.0660	0.0745	0.0824	0.0897	0.0964	0.1025	0.1081	0.1131	0.1176	0.1217
S^*	0.0532	0.0485	0.0441	0.0400	0.0363	0.0327	0.0295	0.0265	0.0237	0.0211	0.0187
c_1^*	0.2217	0.2111	0.2009	0.1909	0.1813	0.1720	0.1629	0.1542	0.1457	0.1376	0.1297
c_2^*	0.4310	0.4271	0.4230	0.4186	0.4139	0.4090	0.4038	0.3984	0.3927	0.3868	0.3807
U^*	-2.14	-2.20	-2.25	-2.31	-2.36	-2.42	-2.48	-2.54	-2.61	-2.67	-2.74

从表3中可以看到,在我们模拟的缴费率变动区间提高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使得稳态劳均资本

存量、单位工资、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私人储蓄、两期消费和效用水平下降,这与杨再贵(2010)结论一致。但是,提高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增加了资本回报率和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由于资本回报率增加,个人账户养老金收益 R^*F^* 是增加的。结合理论部分推导结果可知,提高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导致劳均资本存量、单位工资水平、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的下降和资本回报率上升与理论部分一致。提高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直接增加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的作用大于单位工资水平降低而导致社会统筹养老金的减少作用,因此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增加。对于私人储蓄下降来说,提高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导致的单位工资水平下降直接降低私人储蓄起了主导作用。对于第一期消费水平来说,单位工资下降起了决定作用,而第二期消费下降则是单位工资和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下降共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两期消费都下降也就决定了效用水平的下降。

从表2和表3模拟结果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重要的一点差别,即推迟退休不仅可以提高社会统筹账户的养老金水平而且还能提高第二期消费水平。但是提高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仅能提高社会统筹账户的养老金水平。如果仅从提高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方面来看,提高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和推迟退休的方式基本无差异,但是考虑到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推迟退休就要优于提高统筹养老金缴费率的政策。

7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OLG模型的框架内从理论和数值模拟两方面考察了提高养老金缴费率和推迟退休年龄对劳均资本存量、单位工资、资本回报率、个人和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水平、私人储蓄、消费及效用等经济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提高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率除了能增加养老金个人账户本金积累和降低私人储蓄外,对劳均资本积累、工资、资本回报率、消费、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和效用均没有影响;第二、推迟退休和提高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都会降低稳态劳均资本存量、单位工资、私人储蓄、年轻时期消费及效用水平;第三、推迟退休和提高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都能提高资本回报率、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收益水平;第四、推迟退休可以提高老年期的消费水平,而提高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却会降低老年期的消费水平。

因此,本文的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如果政府想要增加养老金收入水平以缓解养老金所面临的收支失衡压力,提高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和推迟退休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政府不仅要增加养老金收入水平,而且对老年人的消费水平非常关心,要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那么推迟退休就成为比较好的选择。而且从现实来看,中国的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已经较高,给企业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因此总的来看推迟退休也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另外,如果政府想要降低私人储蓄、增加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水平但又不对经济系统中其他因素造成影响,那么提高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率可以实现这一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政策建议都是在仅考虑养老金和消费水平的前提下提出的。如果考虑到经济的其他方面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例如,如果考虑到增加个人一生效用水平、劳均资本存量和产出等,以上政策不但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还会阻碍这些问题的解决。此时,提高社会统筹养老金缴费率和推迟退休的政策就都不可取。另外,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假设人口增长率和预期寿命是给定的,如果人口增长率是内生的结论将会如何变化,这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作者:康传坤(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博士生)

来源:《统计研究》2012年第12期

上海自贸区开启“全球化红利”第二波



国家欲借加速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契机，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推动中国与新一轮全球规则体系接轨的战略考量。

正进入挂牌倒计时的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新一轮“以改革促开放”大战略的重要决策。本世纪的十年可谓是全球化红利期。而今，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新战略已经启动，这势必让中国获得新的增长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

目前，中国建立了 6 种类似的经济特区，包括保税区、保税物流区、保税港区等，上海自由贸易区是国家拟建设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理论界将其视为与 1979 年建立深圳特区、2001 年加入 WTO 同等级别的重大改革举措。

此时，国家推出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到底有什么深远意义？事实上，就大趋势而言，中国以要素红利为主导特征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迫切需要开启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即通过构建新全球价值链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而上海自贸区战略就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上海自贸区所承载的使命体现在：首先，上海自贸区需要担当构建国家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使命。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是我国出口贸易的龙头之一，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加快构建国内价值链，特别是如何积极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应加强自身优势的培育，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

另一方面，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在全球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希望在上海设立亚太区总部甚至全球事业部总部、全球性研发中心。上海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方面，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扩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增长潜能，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发展条件，跨国公司将全球战略重心从欧美市场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区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带来了整个价值链的转移。截至 2012 年 9 月底，上海已累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 393 家，成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无疑，上海自贸区将肩负着如何进一步吸引全球高级要素向中国集聚的“洼地”角色。

上海自贸区战略不仅是国内新一轮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新一轮全球化的倒逼使然。从国际大环境看，当前，不同贸易体系下的谈判内容更加侧重贸易与投资并重、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关联。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加速推进。更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框架、内容、要义等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例如，大多数 TISA 谈判参与方在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等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而我国这些领域的政策仍停留在传统的 WTO 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在上一轮加入 WTO 谈判时仍保留有许多限制外资准入的措施，缺乏参与 TISA 谈判的基本条件。TPP、TTIP 谈判更是由于国际政治等原因，将中国排除在外。目前我国在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一旦 TPP、TTIP 自贸区谈判达成，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贸易规则、标准和格局，挑战现有贸易规则体系。美欧等发达国家将会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方面制定新的规则，这无疑提高了非自贸区成员国的“进入门槛”；另一方面，由于自贸区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会对区外经济体构成更高的壁垒，会产生贸易转移的效果，而这也意味着中国贸易、投资等的国际竞争压力。

鉴于此，国家加速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显然更具全球化视角。一方面，中国正在准备积极参与到全球自贸区谈判中来，并推动中国全方位的自贸区战略，保障中国全球化利益。另一方面，上海在贸易、金融、投资、航运、港口、关税、负面清单、离岸市场等领域进行改革，以及加快服务业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监管等制度环境等重点制度性创新，这正是国家欲借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推动中国与新一轮全球规则体系接轨的战略考量。

作者：张茉楠

来源：中国经济网（2013-9-16）

铁矿石期货获批

国企钢厂担心“被金融化”风险

9 月 13 日，证监会宣布批复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上市铁矿石期货。

国泰君安产业服务研究所副所长林小春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举意义重大。一是意味着钢铁产业链品种实现基本上市，黑色金属避险工具更加完善；二是作为在期货市场中仅次于原油的大品种，可视为商品期货市场的重大发展；三是有益于钢材市场交易，钢铁企业的进一步参与可使钢材市场的活跃达到一定水平。

据了解，铁矿石期货上市在即，国企钢厂态度谨慎，因国资委相关规定，即使加入铁矿石期货交易，也仅停留在套期保值业务，而民企钢厂则对投机业务跃跃欲试。

与金融创新不无关系

铁矿石期货此时获批，与推进金融创新也不无关系。国泰君安金属及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鹏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国际市场上已推出的铁矿石期货合约，类似新加坡市场存在的铁矿石指数期货品种，交易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在金融指数化品种上存在较大的创新空间。”因此，在国际市场相继推出铁矿石指数期货后，尽快推出我国铁矿石期货很必要和紧迫。

证监会发言人表示，大商所已经完成了铁矿石期货合约设计。同日，大商所发布通知，就铁矿石合约及相关规则内容公开征求市场各方建议。

业内人士指出：“铁矿石指数期货由于其对指数过于依赖，将会进一步增强矿商对市场的掌控力。而实物交割方式则可以极大地降低这些优势矿商‘以少博大’的操作空间。另外，实物交割是确保期货拉近现货的有效手段，更能真实地反映现货市场的供需关系，可避免指数期货因被动地跟随指数而

存在的脱离供求关系的可能。”

钢企态度迥异

大商所相关负责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国际长协定价机制打破后,铁矿石价格波动频繁,钢铁企业避险需求强烈,顺应国际铁矿石衍生品市场发展趋,尽早推出铁矿石期货交易,有利于形成公开透明的铁矿石市场价格,帮助现货企业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提高国内铁矿石资源保障能力和促进产业升级,并为国内市场定价话语权的争取增加筹码。

对于铁矿石期货,国内钢企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们认为铁矿石期货上市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又担心期货交易会出现资金炒作,加剧不可控的价格波动风险。

中联钢董事长王利群赞同钢企积极参与铁矿石期货:“这是大势所趋。期货上市后,和钢铁、矿山、铁矿石贸易商没太大关系,参与资本并不局限于此。你不做,有人去做。铁矿石期货对市场以及定价模式会产生不确定性影响,但企业需要主动参与,至于影响是好是坏,得企业自己把握。”

鞍钢集团国贸公司副总经理李达光说,铁矿石期货来了,钢铁企业 “被金融化”,不得不积极应对。“未来鞍钢会涉入铁矿石期货。但对进去的企业而言,不一定是馅饼,也有风险。”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传伟说:“期货跟我们做实体经济的有些距离,我个人认为其在 3~5 年内对铁矿石和钢铁市场负面影响居多。”

因在国有企业参与衍生品交易方面规定严格,国有企业中铁物总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薛小林说,中铁物总也只能根据规定,参与套期保值、规避铁矿石价格下行风险,不能参与投机。

“铁矿石期货上市为钢企创新带来了机会。”作为民企的山西建邦国贸总经理张东亮则称,铁矿石期货上市后建邦国贸将参与投机业务,而不是套保。

来源: 每经网-每日经济新闻 (2013-9-16)

京沪深中心商圈推出国际快运移动作业

为有效解决大城市中心交通拥堵对企业物流造成的困境,国内首创的国际航空快运移动作业基站日前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中心商业区全面推出。

由国内最大的国际航空快递服务供应商中外运敦豪在北京、上海、深圳中心商业区推出的移动作业基站服务模式,使基站服务模式深入城市中心商业区服务,优化了快件转运路线,提升了转运效率,延长了客户截件时间,有效应对了大城市市区和商业密集区的物流难题。

记者 13 日从中外运敦豪获悉,移动作业车通过 3G 无线接入网络,车内配备了先进的影像上传,称重,运单和标签打印设备,平均每票快件可以在十五秒内完成基本出口操作。快件收取操作后,即可直接送至口岸进行出口申报,免除了返回服务中心的常规转运环节,显著地为客户延长了当日截件时间,有效地减少了作业中心高峰期快件集中操作的压力。

大城市商业中心区企业商户密集，交通拥堵，时间成本高昂，对企业的物流效率造成了极大影响。2013 年初，中外运敦豪开始试水移动作业基站服务模式。该模式配备了具备基本快件处理能力的移动作业车，直接对接商业密集区，为企业提供贴身取件服务。目前，中外运敦豪在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部署 8 辆移动作业车，为相关地区的客户最晚推迟取件时间 60 分钟。在北京，中外运敦豪能够为国贸、中关村等地区的用户推迟截件时间 1 小时，助力当地客户轻松搭乘当日最晚的出口航班，在移动作业基站服务地区享受北京最晚的截件时间。

“在国际航空快递领域，转运时间是衡量服务能力的关键指标。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交通状况的日益紧张，移动作业基站服务模式是我们应对城市中心区物流难题的创新举措。”中外运敦豪董事总经理、DHL 快递亚太执行副总裁吴东明表示，移动作业基站服务模式帮助众多客户提高了物流效率，得到了客户的青睐和支持，未来将在更多地区推进这一服务模式。

创建于 1986 年的中外运敦豪由德国邮政敦豪和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各注资一半成立。目前中外运敦豪已经成功地建立了我国最大的国际快递服务网络，服务覆盖全国 400 个城市，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已建立超过 100 家分公司和近 200 处办公设施。国际快递服务可直达其中 131 个主要城市。每周使用超过 500 架次商业航班和专机。

作者：钱春弦

来源：新华网（2013-9-16）

人行强势表态同业问题意在主导协调监管

虽然中国银行间市场上闹的那场“钱荒”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但反思一直并未停歇。央行周四更是首度公开表示，同业业务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问题是造成流动性风险的一个隐患。

业内人士认为，央行此次在谈及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中，着重表态同业业务问题，或意欲通过规范同业发展，树立其强势主导地位。而一个稳定的银行间市场，亦有利于央行未来推出更多符合其金融市场化改革战略部署的创新产品，如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CDs)等。

中国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周四表示，一些机构同业业务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较突出，是造成流动性风险的隐患之一，快速增长的同业业务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金融风险的防范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央行的表态预示未来可能对同业业务采取较强硬的措施。同时讲话中透露出对银监会监管不善的不满，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代表着国务院同意央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系会议制度后，央行有意建立其强势地位。”北京一大型银行交易员说。

国务院此前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重点围绕金融监管开展工作，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成员单位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可邀请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

光大银行首席宏观分析师盛宏清认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未来将对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金融市场上所有的机构都是拿信用去放杠杆，而这个信用最终的承担方，事实上是政府，政府肩负着这么大的责任，加强监管是必须的。这次出台的监管协调机制，不是违背而是更加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此前表示,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从去年开始已渐成中国“影子银行”的主力,目前可能要收紧,但只堵不疏还是未触及根本。当前流动性错配严重,很多就是因为同业业务参与放贷,长资产端搭配短负债端,期限错配赚取息差。

“防止监管套利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影子银行的产生和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监管政策和规定的不一致相关。目前,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也有这种现象。”胡晓炼说。

因此,她表示,重大的监管政策在出台之前应该进行充分的沟通,不同的监管当局对同类业务的监管政策应该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监管标准应该有相应的协调性。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监管部门从各自行业监管和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出台了相应的监管政策和法规要求。对于其中有相互关联的一些政策和规定,都需要在相关部门之间进行充分的协调和沟通,使之相互之间能够有比较好的衔接和一致性。

央行对同业业务的创新和发展到底持何种态度,市场一直莫衷一是。一家同业业务发展激进并因此获利丰厚的股份制银行此前一直相信,央行是支持他们的做法的。而央行此番表态之后,更多业内人士相信,央行不是要把同业业务一棒子打死,而是要引导同业创新向其希望的方向发展,能走一条“正路”。

“央行对同业业务不是取消,也谈不上扼杀创新。而是要‘规范发展,加强监管’。因为马上就要在同业市场上实验推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环,而未来要稳步推进改革的话,也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同业市场。”盛宏清说。

广发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交易员颜岩亦认为,央行还是能够看到同业业务的好处,只是希望能够透明化,正规化,可以全面监管。比如未来会在同业市场上推动 NCDs 的发行,就是比原来的同业业务更先进的发展方向。

路透稍早报导,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将发行大额可转让同业定期存单的方案上报到央行,首批最早有望在 9 月面世。其后,在中资银行的中期业绩说明会上,建设银行

(0939.HK: 行情)(601939.SS: 行情)和中国银行(3988.HK: 行情)(601988.SS: 行情)均表示,已向央行提交了有关材料。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亦建议,应先允许银行发行同业的大额可转让存单,把这些存单的资金计入一般存款,并交纳存款准备金,允许商业银行用这样得来的资金去放贷款。

她认为,银行此前以同业业务参与放贷,定下畸高的利率水平,是扰乱市场秩序的做法,“实际上实体经济能接受这么高的利率吗?而这样的利率公布出去以后,又会给市场带来一种不合理的利率水平的预期。”

推进金融系统市场化改革是中国高层既定的目标,实际上,未来在同业市场上开展的金融创新应该更多。盛宏清认为,围绕 NCDs 开展的同业业务创新就大有可为。如 NCDs 的期限设计、如何定价,以及如何如何设计与之匹配、对冲的衍生品等等。

胡晓炼就表示,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增强,金融机构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的内在驱动,金融创新和新的金融业态、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都使得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这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为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固然应该有效协调、加强监管,但随着金融市场不断改变,监管机构相应调整监管的方式,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指标,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随着金融脱媒的速度加快,商业银行降低负债成本,扩大负债来源,摆脱存贷比考核指标压力的要求

愈加强烈。

“监管层对存贷比等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否则，银行只能另寻一些道路，来倒逼货币政策了。”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债券分析师徐寒飞说。

吴晓灵亦表示，存贷比和贷款规模这两项指标的控制侵蚀了商业银行的金融自主权，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自主权的缺失扭曲了市场行为。银行用理财产品来冲时点，使市场的货币供应链在短时间内剧烈波动，实际上对货币信贷真实信号的反馈是不利的。

盛宏清则认为，央行货币政策要坚持市场化的操作手法，倚重公开市场的操作，对整个资金面进行调控。

“与银行间市场上的机构交换资金、债券产品的量要扩大，正逆回购要交错操作，要更频繁一点。而不是说这段时间就是正回购，那段时间就是逆回购。应使正逆回购的界限逐步融合，使同业市场上的资金价格更容易向央行的基准利率靠拢。这方面，央行应该有所改进。”他说。

为抑制过宽的流动性，今年春节后央行公开市场暂停逆回购，并先后重启了正回购操作和央票发行。不过进入 6 月，资金面紧张形势不断加剧，外汇占款趋减，央行先后暂停了正回购操作和央票发行，又于 7 月末重启逆回购操作，同时对部分已到期的三年期央票进行续发。

胡晓炼表示，加强信息共享制度建设是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切实发挥协调机制作用的重要抓手。要明确信息采集范围，统一采集标准，实现数据信息共享的规范化和常态化，建立覆盖全面、标准统一、信息共享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这将成为金融监管部际协调联席会议的一项重要机制。

“人民银行正在积极推动金融业统计体系的建设，推进建立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理财与资产管理的统计体系。可以相信，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框架下，这一体系的建立将极大地增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监测、分析的能力，为预测、判断、评估和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提供一个顺风耳、千里眼。”她说。

作者：谢衡

来源：路透中文网（2013-9-6）

李克强夏季达沃斯开幕演讲实录

七年前，世界经济论坛从瑞士的高山之巅来到了中国的渤海之滨，当时我正在辽宁工作，亲身经历了夏季年会的创办工作。7 年过去了，达沃斯论坛的夏季年会轮流在中国的大连和天津举办，影响越来越大，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政要、企业界、媒体的朋友。大家共享着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交流着体会。此次论坛的主题叫做“创新：势在必行”，这本身就反映了世经论坛历来所具有的前瞻性和引领性。我相信这会激发与会者更多的思想火花。

从 2008 年 9 月至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整整五年。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是错综复杂，有些发达经济体刚出现一些好的迹象，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又面临着下行等诸多压力。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受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有所放缓，让世人瞩目。昨天，我和施瓦布先生一起与部分企业家进行了交流，大家对中国经济当前、未来发展的态势、走势都十分关心。一段时间以

来,国际上对中国经济也有不少议论,有担心会不会出现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增长过缓问题,甚至出现所谓的“硬着陆”。我想告诉大家,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经济运行是平稳的。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从去年四季度的 7.9%下行到了 7.7%,二季度又下行到 7.5%。投资、消费、外贸增速都出现下行的趋势。而且中央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负增长,引起一些担心和议论。这是难免的。但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措施,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保证了经济平稳运行。

第一,兼顾当前和长远,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下行时,用短期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速推高,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权衡利弊,我们认为这样无助于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因而选择了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策略,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这本身就不容易。在财政政策方面,坚持不扩大赤字,而是调整支出结构,压缩行政开支,加快支出进度,尤其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结构调整和保障民生的支持,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在货币政策方面,保持定力,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我们也沉着应对,不畏艰险,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重点是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我们还通过加强监管和规范发展,积极防范与化解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对大家都很关心的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我们正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有序规范和化解。可以有把握地说,总体是安全可控的。

第二,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改革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本届政府开门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变革。今年以来,我们已取消和下放了 200 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目的就是是通过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我们扩大了“营改增”试点范围,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领域改革。推进结构性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金融、石油(行情 专区)、电力(行情 专区)、铁路、电信、能源开发、公用事业(行情 专区)、服务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投资增长,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发展要依靠改革,也离不开开放。我们不断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子,上半年与欧洲国家瑞士和冰岛签署了自贸协定,最近又与东盟领导人商议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在投资准入、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方面探索经验。我们还推出了提高对外贸易便利化等措施来促进进出口的平稳增长。

第三,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扩大内需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主要任务,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基本途径,发展服务业是重要的战略支撑。我们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增加节能环保、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等方面的投资,加大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支持力度。还专门出台政策措施,促进养老、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发展。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促进科技和经济的深度融合,营造创业、创新的社会环境。

今年以来,中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协调推进,得益于宏观管理方式的创新。我们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和当前实际,科学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这也可以说是预期调节的预警线。同时,制定与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相配套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总量政策就保持稳定,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点是调整经济结构,主动力是推进改革创新,以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创新的动力和改革的红利,来激发市场的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些举措,使中国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向好的势头。从 7、8 月份情况看,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PM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工业增加值、进出口、用电量、货运量等主要指标普遍回升，实体经济活跃，城镇就业继续扩大，物价总水平保持稳定，市场的信心在增强，社会预期向好。这种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使我们坚信，中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主要任务一定会实现。同时，我们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清醒地看到，目前经济回升的基础仍不牢固，不确定因素还很多。我们不能也绝不会掉以轻心，会用坚定的信心、毅力、智慧去克服困难和挑战，做好各种准备。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经济持续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7.5%左右的增速与过去中国两位数增长相比是慢了一些，但从世界范围看，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的高速度。中国经济总量比过去明显增大，目前又进入了转型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符合发展规律。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如果能够实现中高速长期持续增长是不容易的，也是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贡献。尤其是我们未来的增长必须是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必须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为支撑，必须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必须是保证就业和居民收入相应增加的增长。也就是说，要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展望未来，中国发展前景光明。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任务远未完成，区域发展的回旋余力和市场潜力巨大；改革大势不可逆转，推进改革必将释放出新的制度活力。只要我们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下去，咬定长远发展目标不放松，解决眼前问题不懈怠，中国这艘经济巨轮一定能够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中国经济一定能保持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我们一定会努力实现而且必将实现这一目标。

女士们、先生们！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我们同住一个“地球村”，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变成离群索居的“鲁宾逊”。我想很难找到现代“鲁宾逊”了。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对外开放中获益匪浅。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预计未来 5 年中国进口将达 10 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 5000 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 4 亿人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将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愿与世界共同分享这一巨大的商机，也希望各国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更好的合作环境。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当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也会相应增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成人之美”。只有美人之美，才能美美与共。我们愿意更多参与国际治理，尽可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减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分担应有的责任。当然，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标准，我们还有一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有漫长的、艰辛的路要走，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只能与自己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应对跨国金融风险的准备，加快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尽可能减少一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带来的冲击。各国还应进一步扩大相互开放，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齐心协力做大世界经济这块大蛋糕。中国将一如既往鼓励外国公司来华投资兴业，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环境。我们将继续用事实证明，选择中国是跨国公司兴旺发达的明智之举、上乘之策。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变革的时代，变革呼唤创新，创新推动进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贯穿着改革创新的理念和精神。创新是我们永远高扬的旗帜。希望在座的全球经济新领军者成为各自领域改革创新的生力军。多年来，夏季达沃斯论坛成为聚焦中国经济的重要平台，发挥着独特作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我们愿

意也希望更精彩。我相信，夏季达沃斯会越办越好，不仅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多彩风貌，也为世界和中国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凝聚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最后，预祝本届年会和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在中国、在大连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谢谢！

作者：李克强

来源：FT 中文网（2013-9-11）

李克强施政路线图渐明晰

身处互联网时代，中国总理李克强也打趣“不存在现代鲁宾逊”，夏季达沃斯仍旧冠盖云集。既然是中国主场，依惯例，中国最高级别官员总是最受关注，前有温家宝，今有李克强。李克强首次以中国总理身份亮相达沃斯，正值中国经济备受关注之际，当他阐明其施政路线图时，国人与世界自会聆听。

从李克强 3 月 15 日上任以来，“李克强经济学”成为热门词，但是政策内涵却众口纷纭。与往届中国总理在达沃斯宣言改革开放一致，李克强演讲也以改革开放为关键词。不同的是，上任刚好半年的李克强为改革开放制定了有其特色方案，其施政路线图日趋清晰，包含三个要素：首先是认可增速中枢下移而不短期刺激，其次以自贸区等制度建设促进开放，最后则是激活市场活力。

首先，认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从高速降低到中高速的自然趋势，不会为追求之前的高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步调。李克强强调，要避免为了短期经济绩效而求助于短期刺激政策。“权衡利弊，我们认为这样无助于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因而选择了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策略，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这本身就不容易。”

这实际上延续了李克强 9 月 8 日在英国《金融时报》署名文章中的表态，那就是面对外界对中国“硬着陆”的担忧、改革是否继续的疑问，他坚称，中国将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将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

其次，坚持开放也是李克强一贯基调。这是李克强第二次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选择国际媒体发声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对话姿态，他在本次达沃斯期间的活动安排频次和参与时间也显然高于前任，显然有阐释施政意图、稳定外界预期之意。在 2012 年的博鳌论坛，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就强调开放，表示秉承开放包容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可参见此前专栏《李克强的博鳌方案》）。

延续这一思路，李克强构思的开放路线也有不同的着手路径。回顾历史，在中国的开放过程中，外来刺激的作用不可小觑。第一波开放划定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以边缘革命的方式为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第二波开放则以加入 WTO 的方式，一次性提升了中国与全球经济接轨的水平与规模。现在，李克强构思的第三波开放，思路逐渐明晰：他上任以来力推上海自贸区，不仅仅是探索如何强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而且是如何引进现代经济运行的一系列国际通用做法与游戏规则。

当前多哈贸易多边会谈仍在僵持中，继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美国和欧洲又启动 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贸易谈判，而中国都未被邀请“入座”。上海自贸区的出现，也是对于 TPP 等外界变化的主动回应。李克强表示，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探索负面清单管

理模式，重点在投资准入、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方面探索经验。

这一试验能否成功关系全局，对外开放的成功要点何在？上限在于放开制度创新，下限在于守住金融风险。事实上，在达沃斯在回答瑞士信贷集团董事会主席乌尔斯·罗纳关于金融开放的问题时，李克强也特别强调，金融改革当中重要问题是要防范金融风险。他透露中国在不断推进监管体系的完善，也在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把防范风险的工作做到位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就会进一步加快。”

上海自贸区虽然只有 28 平方公里，各界寄托想象甚多，对自贸区金融领域开放的呼声尤其高。在上海自贸区进一步开放外资机构准入、开放金融服务、放开民营银行等非常必要，但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措施，应充分考虑其全局效应。当前中国经济杠杆比率已经非常高，甚至透支了未来的空间，未来十年内去杠杆压力将会激增。在国内金融市场深度不够、金融制度滞后、金融机构同质竞争情况之下，对比国际经验可知，以放开资本账户管制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往往有诱发金融危机风险。

最后，除了开放之外，李克强的改革也自有其不同以往的特色，那就是他多次强调激活市场的活力，各项改革措施都以激活市场活力为目标，进一步剔除经济体制中残留的双轨制，无论价格还是准入。例如，李克强履职之后承诺并大力推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和下放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放开多行业市场准入，以求“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长期以来，企业普遍抱怨政府的有形之手约束了企业的创造与探索自由。李克强式改革就是希望通过约束政府、留给市场更大的空间来激活市场活力。

那么谁最能代表市场？对于中国而言，自然是市场中的自由个体和民营企业。虽然这次李克强破例在论坛开幕之前接见参会的中外企业家，遗憾的是提问方基本是自国外企业家，罕见民营企业身影。而大连本地的企业家王健林则表示，第一届夏季达沃斯时来了很多中国企业家，以后每届减少比较多，他很遗憾他的很多好朋友都没来参会。

回头来看，开放是手段，改革是目的，对外的开放最终要落实到对内的改革。刚刚故去的经济学家科斯在回顾中国变革历程时，指出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所谓“边缘革命”则由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边缘力量”推动，最终促成中国经济的市场转型。

当下是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增长下行成为长期趋势，国内利益集团纵横蟠扎，中国正在酝酿一次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突围。不过，如果经济之外的体制既定，经济领域的改革能够走多远呢？或许，中国应该再度重视边缘力量，让其回到中心。

作者：徐瑾

来源：FT 中文网（2013-9-11）

中国国债期货定价锚效应长远可期

中国首个场内利率衍生品国债期货在现货最大持有者银行保险均缺席的情况下，18 年后选择重新登场，在利率市场化加速的背景下，显示监管层对金融机构利率风险管理的重视；虽然期现货投资者结构错位，短期或致成交活跃度有限，但国债期货中长期对现货市场的定价锚效应不可忽视。

中国银监会和保监会至今未出台参与国债期货交易指引的重要原因，仍是金融分业格局下业务发展带来的混业诉求，给监管容忍边界带来的挑战，好在金融联席部际协调机制已经建立，业内寄望机制能尽快发挥实质效应。

9 月 6 日，国债期货正式上市，合约采用 5 年期，票面利率 3% 的虚拟标准券的形式，交割月剩余期限在 4-7 年的国债都可用于实物交割。

TF1312 收盘较首日挂牌基准价 94.168 元人民币上涨 0.002，日高/低介在 94.140-94.540 间，并未出现非理性涨跌停行情。

从国债期货的供求分析，出现这种理性行情略好于市场预期，因从期限及投资者结构来看，国债期货初期的套期保值功能都有限，初期市场其实以投机力量为主。

国债期货的账户分三种，套期保值，套利和投机，目前前两种的具体操作指引还未明确，投机账户则有持仓限额的规定。

期限结构上，国债期货对冲的是 4-7 年期品种的利率风险，还未有 30 年，10 年，3 年及 1 年等其他关键期限品种。

而从 8 月底中债登记账式国债托管期限数据来看，3-7 年品种的占比只有 1/3 左右，这还没有去除大量躺在银行投资户帐户上，因会计核算要求不同没有套期保值需求的规模。

欲浏览银行间记账式国债托管期限结构图，请点选 link.reuters.com/cap82v

从投资者结构来看，国债期货与现货的脱节更明显。目前 7.5 万亿元国债存量中，持有在此次首批可以参与国债期货的投资者如证券投资基金，交易所等的总量只有 3,000 亿元左右。

在初期一个投机力量主导的市场，首日运行平稳可谓实属难得。不得不提中金所的谨慎周到，不但将交易最小变动单位由 0.01 元调降到 0.002 元，提高了相关保证金比例并降低了持仓限额，最大限度地控制了风险。

另外，光大证券乌龙事件之后，期货公司的保证金逐笔盯市制度也有望避免逐日盯市带来的买卖失控风险。

不过，确实需要尽快推进国债期货品种及投资者结构多元化的程度，因一个严格控制风险的期货市场，投机动能被抑制，套期保值动能缺席，运行平稳的反面或许会带来后期流动性缺乏的担忧，这在台湾市场已有先例。

事实上，从上市首日的尾盘来看，交易活跃程度就明显低于开盘，全天成交量仅 323 亿元左右。虽然短期对国债期货或不可期待太高，但中长期而言，国债期货市场的利好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特别是定价锚效应值得期待。

初期可能是现货市场影响期货价格，但若银行逐渐加入后，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将更加凸显。除此之外，则是未来和利率互换市场的相互补充。场外的利率互换市场虽然名义本金成交额逐年上升，但对银行来说，毕竟是对冲的短期现金流风险，与国债期货的中长期套期保值功能还是无法比拟。

另外，国债期货此次采取的是中金所双边开设账户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国债跨市场托管的难题，但未来若最便宜交割债券能在交易所活跃成交，而非在银行间由个别机构持有，不仅有助于解决初期可能因现货缺乏，而被迫出现大量现货持有者只能卖空期货的单边行情，而且也有利于债市互联互通的推进。

最后，则是在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人民币如果要增加海外吸引力，成

熟市场投资必然要求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国债期货料将在人民币走出去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徐永路

来源：路透中文网（2013-9-6）

金融危机：救市大战留下的五个教训

全球金融系统一度濒临崩溃的危机过去五年后，现在美国人有很好的理由来庆祝胜利了。

毕竟，美国经济正在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重回危机前水平。失业率正在下降。银行业重拾活力，并且偿还了纳税人向其注入的几乎全部 2,450 亿美元救助资金。美国股市和家庭值已经收复了全部失地。

或者，美国人可能也有理由怀疑为何情况还是那么糟糕，并且会问，如果在一些方面采取不同的做法（采取某些措施，避免另外一些措施），是否可以缓解持续了很久的经济痛楚。

即便是在经济实现了四年增长之后，仍有 1,130 万人处在失业状态。就业人数有所上升，但就业岗位仍比 2008 年的高峰期要少 190 万个。

住宅价格正在攀升，但是每六个住房抵押贷款持有人中就有一个人的贷款金额高于其住房的价值。最新估计数据显示，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收入比 2008 年 9 月份低 5%。

公众普遍对整个银行业救助计划感到不满，一大部分人认为华尔街获得了救助，而普通民众没有受到这种待遇。负责管理美国财政部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简称 TARP)的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说，为了救助经济，我们不得不违反了美国人的一个核心原则：谁选择某种风险，谁就应该承担风险带来的后果。

金融危机五年再回首早就到了确认这场拯救全球经济之战的关键时刻的时候了，也早该对救市原则进行一番讨论了。救市确实阻止了“大萧条 2.0 版”的发生，是的，情况原本可能会更糟。但情况是否原本有可能会更好？一些政策失误是否令危机恶化，或者说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隐患？

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罗闻全(Andrew Lo)指出，围绕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应对政策的讨论依然非常激烈。他说，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上，我们还没有决定开始研究这些失误，就像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对一次空难进行研究以提高飞行安全那样。

多大才算太大？第一个倒下的华尔街多米诺骨牌是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在政府的帮助下接住了这张牌，许多投资者由此得出结论，政府不会让任何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倒下——这个想法在随后几个月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救助贝尔斯登，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在 2008 年 3 月份让 290 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承担了救助风险。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曾把这一措施称为“最艰难的选择”。他当时说，难就难在这是“第一次”，也就是说美联储首次将安全网覆盖至一家不受其监管的银行。

贝南克及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Henry Paulson)和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行长的盖特纳(Tim Geithner)说，救助贝尔斯登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家公司与金融系统其它领域有密切联系。他还指出，纳税人会悉数拿回他们的钱。

批评人士反驳称,如果他们让贝尔斯登倒下,投资者就不会在后来那么乐意借给其他华尔街公司钱,也就不会令金融系统最终由内向外爆发的危机恶化。前美联储高级官员莱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曾将不让贝尔斯登倒下的决定称为“二三十年内最糟糕的政策错误”。

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是一张大多米诺骨牌,这家投资银行受到了不良房地产贷款的拖累。任由这家银行在 2008 年 9 月份走向破产是整个危机中事后讨论最激烈的一个决定。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学家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说,事后看,说它不是一个错误决定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米什金在 2008 年 8 月份离开美联储管理委员会。

但他说,当时让雷曼兄弟倒闭是有理由的,要以此让华尔街吸取教训。每个人都认为美联储会救助雷曼兄弟,而雷曼兄弟利用这一点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大事记:震动美国金融系统的事件米什金说,央行官员和其他监管人员一直在说,你要强硬,但前提是不能让系统崩溃。当然,难就难在你要知道何时强硬,何时通过干预避免系统崩溃。

雷曼兄弟首席执行官富尔德(Richard Fuld)对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说,他一直都认为公司会在政府的帮助下获救。他曾向鲍尔森说,如果你可以给我们提供过渡性贷款,我们就能让雷曼兄弟重新振作,我们可以解除这些头寸,这桩丑事基本就能遮掩过去。当然,政府拒绝这样做。

贝南克在一年后对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说,我们当时都很清楚,雷曼兄弟倒闭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财政部和美联储曾尝试出售雷曼兄弟,但无法如愿。虽然贝南克、盖特纳和鲍尔森在当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但他们现在都说当时别无选择,只能让雷曼兄弟倒闭。

贝南克说,我至死都会坚称我们当时已经竭尽全力拯救雷曼兄弟,但由于缺乏合法的权限,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

鲍尔森说,如果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在 2008 年时就拥有国会 2010 年才授予他们的权利,则他们将会接管雷曼兄弟;情况可能会一团糟,但结果可能会更好。

第二天,全球市场陷入全面恐慌,美联储极不情愿地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这家大型保险公司因为大规模投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而导致亏损。

最终,美联储和财政部向美国国际集团注入了 1,820 亿美元。作为交换,美国纳税人取得了该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这些股票目前已经被全部出售,据财政部计算,纳税人不仅全数收回了他们的资金,还赚了 230 亿美元。美国国际集团目前的规模仅为危机前的一半。

但接管美国国际集团的做法在政界引发了强烈反应,尤其是在高盛(Goldman Sachs)和其他与美国国际集团进行过交易的公司获得全额偿还的消息曝光后,此外该公司还将部分救助资金用于为引发危机的部门的高管和交易员发放高额奖金。

TARP 下的意外。雷曼兄弟的倒闭以及随后的连锁反应导致美国国会极不情愿的批准了小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有关将 7,000 亿美元纳税人资金注入 TARP 来拯救银行业的申请。鲍尔森起草的这一计划虽然在实施前有所改动,但大体实现了政府的目的,并且纳税人最终承担的成本甚至要低于乐观人士在 2008 年的预期。

鲍尔森对美国国会表示,TARP 将被用于从银行收购“有毒资产”,也就是永远无法全额偿还的住房抵押贷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财政部通过购买银行股票来提振银行的资本状况。

鲍尔森如今说,危机的严重性和不断扩大的特性意味着我们经常会仓促行事,实施 TARP 的某些目标虽然没有达到,但在另一方面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TARP 的条款仍存在争议：同意让受救助的银行继续支付股息；随后使花旗集团(Citigroup)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获得救助；对高管薪酬的限制（有人指责其过紧，有人指责其过松）；获得 TARP 资金和发放更多贷款之间的关系（或者，前者有时并没有起到促进后者的作用）。

在国会要求下成立的一个监督委员会后来说，TARP 在极其不确定的时刻为市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但也留下了一项麻烦重重的遗产，即在市场内造成了持续的扭曲、令公众对政策制定者恼火不已以及缺乏完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估计，至于最初的 7,000 亿美元，其中的 4,280 亿美元已经或将要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偿还。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纳税人最终承担了 210 亿美元。

一场重塑美国经济的风暴政府拯救银行的行动最成功的一点是饱受诟病的“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最初在 2009 年初引入，目的是评估 19 家大型银行的实力，并且强制要求未通过测试的银行进行筹资，这一点至关重要。

尽管欧洲后来也采取了压力测试的模式，但与美国相比，欧洲版本的压力测试既不够激进，要求也不够高。今天，欧洲那些步履蹒跚的银行继续制约着欧元区经济增长。

美国的汽车业。事后看来，对美国汽车行业的救助似乎是极其成功的。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认为，汽车业规模“太大而不能倒掉”，至少不能再金融恐慌的时刻倒掉。总体算来，纳税人提供了大约 800 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说，迄今为止，已经收回了其中的大约 510 亿美元。克莱斯勒(Chrysler)已经偿还了贷款。对于其在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的剩余权益，纳税人几乎肯定会承受一些损失。

底特律的汽车厂商如今已确信无疑地重新开始盈利，这要部分地归功于政府领导下的重组。重组清理了美国汽车业的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减轻了汽车业的债务负担，并且让很多企业降低了工资标准，实施了更灵活的工作条例。这帮助汽车厂商提高了价格，并把利润投入到更加高效的汽车和卡车中去。

自 2009 年 6 月以来，汽车和配件行业已经增加了 19 万个工作岗位，虽然该行业的总体雇员数已经较危机之前大为减少。

救助行动也留下了后遗症。就如同 TARP 监督委员会所言，救助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对美国的任何一家公司而言，如果其倒闭将导致足够数量的人员失业，或是对经济造成足够的损害，就会得到政府的支持。

房地产市场的宿醉。房地产市场下跌 30%令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以及国会面临痛苦的选择，而这些选择绝不会令任何人满意。而且直到近期，房地产市场一直都是压在美国经济上的一个重担。

在最糟糕的时候，差不多四分之一美国人的抵押贷款高过了他们住房的价值。根据 CoreLogic 提供的房地产数据，在过去的五年间，贷款机构已经将 450 万套住房止赎。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项目帮助解决一些住房所有者的困难。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首字母缩写名称。许多人都因此受益。在其中一个项目的帮助下，将近 90 万笔抵押贷款条款得以修改，减少了每月支付金额。大约有 270 万笔抵押贷款获得帮助，以较低的利率得到了再融资。

但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得到帮助。负责管理 TARP 的卡什卡利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这些项目都失败了，因为这些项目的初衷是帮助那些只需要适当协助的人们，而这些人只占陷入困境的购房者的很小一部分。

曾经有过推出更大力度措施的讨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的前负责人贝尔(Sheila Bair)说,我们原本可能采取力度大得多的行动,没错,这样的行动实施起来会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

但这些计划也可能代价高昂。这意味着为了帮助那些买了自己本来买不起房子的人,或者要让债券持有人出血,或者要向那些没有买自己本来买不起房子的人征税。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认为,这种做法行不通。

盖特纳今年在一次采访中说,住宅市场是人们的预期与现实情况差距最大的领域,我们没有 5,000 亿或者 7,500 亿美元资金来帮助削减住宅抵押贷款本金,这样做将是一个非常低效的提振经济的方式,并且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不公平的。

经济:仍在恢复中。

危机过去五年后,金融系统已经有所恢复,并且偶尔会出现对过去的过度借贷情况可能抬头的担忧。但尽管实施了特别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尚未完全恢复。

目前一个未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是错误的应对方式吗?还是它们因为力度太小而无法达到效力呢?

从 2008 年开始,政策制定者们重新翻开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作,重新考虑了他们在上世纪晚期在日本面临通货紧缩(或者说,物价下跌)时提给日本的建议。凯恩斯是 20 世纪中期的英国经济学家,曾为医治“大萧条”的伤痛开出了增加开支和减税的药方。

奥巴马的减税和增支措施得到了国会批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计算,这些措施的规模将在 10 年内达到 8,300 亿美元。美联储于 2008 年 12 月将短期利率下调至接近于零的水平,而在近五年后,美联储承诺说要将这个水平继续保持几年。考虑到这可能还不够,美联储又以电子方式发行了约 2.8 万亿美元用于购买债券,以压低长期利率,这是前所未有地展示货币政策力量。

然而过去几年的每一年之初都会有人预测,这一年美国经济增长将达到 3%或更高;到目前为止,每年的结果都让人失望。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美国商品和服务总产出在 2017 年之前都无法发挥全部潜能。失业率仍保持在以前只有衰退时期才有的水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共和党人常常注意到的那样,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看上去似乎是失败了。盖特纳指出,美国遭遇了持续的坏运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有日本海啸和核事故之后的混乱。

奥巴马政府高官和美联储官员周日说,他们原本倾向于加大政府开支,以弥补私营领域需求的不足。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说,我们削减赤字的速度比理想的速度要快,因此我们遭遇了原本无需经历的较慢增长。萨默斯曾是奥巴马的顾问之一,目前是接替贝南克美联储主席职务的主要人选。

负责应对危机的决策者们认为,如果没有刺激措施,经济原本会更糟糕。私营领域经济学家支持这一观点的也大有人在。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此信服。斯坦福经济学家泰勒(John Taylor)说,政府政策正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他开出的药方是减少联邦开支、缩减过剩的货币供应,同时回归可预测的货币政策,更多地依据规则,而不是美联储官员的裁量。

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是,不确定性和焦虑也抑制了经济活动。

前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多德(Christopher Dodd)说,有时人们似乎感觉好一点儿了,然后他

们又打了退堂鼓；缺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安全感是我们的经济尚未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后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Law)部分以多德的名字命名。

作者: David*Wessel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13-9-10)

中国商学院靠什么脱颖而出？

第三届“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对话院长、教授精彩观点

自2013年3月第三届“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项目正式启动至今，调研组已经与18位国内顶尖商学院院长、副院长、项目负责人、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与调研，聆听商学院领军人物对目前中国商学院发展的思辨及各学院的特色介绍，为今年的《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报告》收集最全面、详尽的调研信息。

在中国商学院市场国内外竞争的背景下，各学院应如何在激烈的竞争力中脱颖而出，以特色竞争力打造学院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是本届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所重点挖掘的内容之一。参与访谈调研的院长、副院长、教授们与项目组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如下是部分精彩内容回顾：

中国商学院教育市场空间巨大

在与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全允桓教授的对话采访中，全教授用一组数据客观描绘了中国商学院的巨大发展空间：“美国每年有16万的 MBA 学生，印度每年也招10万 MBA，中国才招4万。”“目前美国的 MBA 已经有300万毕业生，中国才30万。”由此可见，中国的商学院虽然面对着激烈的竞争，但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及对高素质企业管理人才的渴求背景下，商学院的市场空间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

EMBA 教育的两极分化趋势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汤谷良教授看来，EMBA 教育的市场愈发细分化，学员的要求也越来越个性化，因此商学院在市场定位与产品设计方面就必须不断细化，同时要保持持续创新的意识，对外经贸的资本运营班和影视传媒管理班正是基于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商学院的“才”智全球化

坐拥中国的世界门户地理位置，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拥有着无可比拟的国际化特性。以生源比例来说，15%的学生来自香港本地，其余学生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在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黄德尊院长的眼里，商学院的“才”智全球化关键在于通过师资与课程的设置，以培养既立足本土，又放眼全球的学员。学院近期推出一个针对中国的 EMBA，里面设计了很多文学、国学等相关沙龙活动；学院还通过如与法国 HEC Paris、剑桥大学等国际一流商学院合作开设双学位课程，培养学员的国际化视野及环球智慧。

商学院如何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在国内商学院纷纷设计海外学习模块以满足中国企业家“跨国游学”的需求同时，对于商学院国际化的各种质疑也纷至沓来，有些项目名为游学实为观光旅游，究竟商学院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化？中欧工商管理学院 EMBA 项目主任陈杰平表示，中欧的海外模块设计旨在通过其“全面性”以帮助学生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帮助企业“走出去”：北美模块与美国康纳尔大学合作，在欧洲则与 IMD（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及西班牙 IE 商学院合作，在亚洲则与韩国国立大学合作。

与中欧不同的是，同济-曼海姆 EMBA 项目则是通过借助传统优势强调海外模块的“专”，该项目正是基于曼海姆大学在企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顶尖优势而推。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主任姚明认为：国际化的最低要求，是要将国外的经验、理论框架与中国商业社会的现状相结合。

让管理思想“落地”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来自海外的学生希望参与到中国这样一个繁荣的市场竞争中，同时本土的学生需求也产生了新的变化，面对这一新变化，北大国际（BiMBA）副院长张黎教授提出了让管理思想“落地”的主张，他认为商学院的管理学教育，应该要考虑到国外的案例在中国这个市场不能运用，如何应就中国学生的思维习惯，结合中西方教育的特点应人施教，引导学生把管理学的东西落地，学会在中国适用。

商学院的“竞”与“合”

中国的商学院一方面借鉴海外商学院的优势理念及教学方法，不断学习成长，另一方面也在致力打造本土化竞争优势及特色竞争力，面对这种“竞”与“合”的关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院长陆亚东教授认为：“商学院之间应当竞中有合、平台协作、互补共赢”。这一点在“中国商界领袖境界提升”项目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是一项由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10所高校联合发起的 EDP 项目，用中大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李仲飞的话说，该项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整合校际资源、通过项目弱化竞争关系同时把实惠带给学生。浙江大学 EDP 中心主任孙建平也高度认可了该项目在整合各商学院优秀资源，为学员搭建一个全国性的学习平台所发挥的创新性作用。

随着“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项目的展开，我们将对话更多商学院领军人物，陆续带来更多精彩观点，详情请参看项目官方网站：<http://research.21cbh.com/>。

来源：21俱乐部（2013-7-4）

2003Q1-2012Q3 企业景气指数

时间	企业景气指数景气值	同比
2012Q3	122.80	-12.80%
2012Q2	126.90	-11.00%
2012Q1	127.30	-13.00%

2011Q4	127.80	-10.20%
2011Q3	135.60	-2.30%
2011Q2	137.90	2.00%
2011Q1	140.30	7.40%
2010Q4	138.00	7.40%
2010Q3	137.90	13.50%
2010Q2	135.90	20.00%
2010Q1	132.90	27.30%
2009Q4	130.60	23.60%
2009Q3	124.40	-4.20%
2009Q2	115.90	-21.50%
2009Q1	105.60	-30.60%
2008Q4	107.00	-36.60%
2008Q3	128.60	-16.10%
2008Q2	137.40	-8.60%
2008Q1	136.20	-3.50%
2007Q4	143.60	4.20%
2007Q3	144.70	8.00%
2007Q2	146.00	10.10%
2007Q1	139.70	8.20%
2006Q4	139.40	7.67%
2006Q3	136.70	4.66%
2006Q2	135.90	4.19%
2006Q1	131.50	-0.96%
2005Q4	131.73	-3.00%
2005Q3	132.04	-2.55%

2005Q2	131.71	-2.72%
2005Q1	132.46	-3.44%
2004Q4	134.73	-1.24%
2004Q3	134.59	1.64%
2004Q2	134.43	17.83%
2004Q1	135.90	4.69%
2003Q4	135.97	6.87%
2003Q3	132.95	5.97%
2003Q2	116.60	-8.85%
2003Q1	131.21	13.23%

2012Q3 行业景气指数

行业名称	时间	景气趋势
企业景气指数	2012Q3	↓ -12.80
工业	2012Q3	↓ -6.10
采矿业	2012Q3	↓ -52.50
制造业	2012Q3	↓ -3.8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012Q3	↑ +7.70
建筑业	2012Q3	↓ -15.9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12Q3	↓ -16.3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012Q3	↓ -18.40
批发和零售业	2012Q3	↓ -19.70
住宿和餐饮业	2012Q3	↓ -12.20
房地产业	2012Q3	↓ -11.40
社会服务业	2012Q3	↓ -18.00

来源：前瞻网（<http://www.qianzhan.com/qzdata/jqzhishu/2043825P2560080.html>）